

美食家

陆文夫

一、吃喝小引

美食家这个名称很好听,读起来还真有点美味!如果用通俗的语言来加以解释的话,不妙了:一个十分好吃的人。

好吃还能成家!这是我万万没有想到的。想到的事情往往不来,没有想到的事情却常常就在身边;硬是有那么一个因好吃而成家的人,像怪影似的在我的身边晃荡了四十年。我藐视他,憎恨他,反对他,弄到后来我一无所长,他却因好吃成精而被封为美食家!

首先得声明,我绝不一般地反对吃喝;如果我自幼便反对吃喝的话,那么,当我呱呱坠地之时,也就是一命呜呼之日了,反不得的。可是我们的民族传统是讲究勤劳朴实,生活节俭,好吃历来就遭到反对。母亲对孩子从小便进行“反好吃”的教育,虽然那教育总是以责骂的形式出现:“好吃鬼,没有出息!”好吃成鬼,而且是没有出息的。孩子羞孩子的时候,总是用手指刮着自己的脸皮:“不要脸,馋痨坯;馋痨坯,不要脸!”因此怕羞的姑娘从来不敢在马路上啃大饼油条;戏台上的小姐饮酒时总是用水袖遮起来的。我从小便接受了此种“反好吃”的教育,因此对饕餮之徒总有点瞧不起。特别是碰上那个自幼好吃,如今成“家”的朱自治以后,见到了好吃的人便像醋滴在鼻子里。

朱自治是个资本家,地地道道的资本家,绝不是错划的。有人说资

本家比地主强,他们有文化,懂技术,懂得经营管理。这话我也同意。可这朱自治却是个例外,他是房屋资本家,我们这条巷子里的房屋差不多全是他的。他剥削别人没有任何技术,只消说三个字:“收房钱!”甚至连这三个字也用不着说,因为那收房钱的事儿自有经纪人代理。房屋资本家大概总懂得营造术吧,这门技术对社会也是很有用的。朱自治对此却是一窍不通,他连自家究竟有多少房屋,坐落在哪里,都是稀里糊涂的。他的父亲曾经是一个很精明的房地产商人,抗日战争之前在上海开房地产交易所,家住在上海,却在苏州买下了偌大的家私。抗日战争之初,一个炸弹落在他家的屋顶上,全家有一幸免,那就是朱自治——到苏州的外婆家来吃喜酒的。朱自治因好吃而幸存一命,所以不好吃便难以生存。

我认识朱自治的时候,他已经快到三十岁。别以为好吃的人都是胖子,不对,朱自治那时瘦得像根柳条枝儿似的。也许是他觉得自己太瘦,所以才时时刻刻感到没有吃够,真正胖得不能动弹的人,倒是不敢多吃的。好吃的人总是顾嘴不顾身,这话却有点道理。尽管朱自治有足够的钱来顾嘴又顾身,可他对穿着一事毫无兴趣。整年穿着半新不旧的长袍大褂,都是从估衣店里买来的;买来以后便穿上身,脱下来的脏衣服却“忘记”在澡堂里。听说他也曾结过婚,但是他的身边没有孩子,也没有女人。只有一次,看见他和一个妖冶的女人合坐一辆三轮车在虎丘道上兜风,后来才知道,那女人是雇不到车,请求顺带的,朱自治也毫不客气地叫那女人付掉一半车钱。

朱自治在上海的家没有了,独自住在苏州的一座房子里。这房子是二十年代末期的建筑,西式的。有纱门、纱窗和地毯,还有全套的卫生设备。晒台上有两个大水箱,水是用电泵从井里抽上来的。这座两层楼的小洋房坐落在一个大天井的后面,前面是一排六间的平房;门堂、厨房、马达间、贮藏室以及佣人的住所都在这里。

因为我的姨妈和朱自治的姑妈是表姐妹,所以在抗战后期,在我的父亲谢世之后,便搬进朱自治的住宅,住在前面的平房里。不出房钱,尽两个义务:一是兼作朱自治的守门人,二是要我的妈妈帮助朱自治料

理点家务。这两个义务都很轻松,朱自治早出晚归,有家没务,从来也不要求我妈妈帮他干什么。倒是我的妈妈实在看不过去,要帮他拆洗被褥,扫扫灰尘,打开窗户。他不仅不欢迎,反而觉得不胜其烦,多此一举。因为家在他的概念中仅仅是一张床铺,当他上铺的时候已经酒足饭饱,靠上枕头便打呼噜。

朱自治起得很早,睡懒觉倒是与他无缘,因为他的肠胃到时便会蠕动,准确得和闹钟差不多。眼睛一睁,他的头脑里便跳出一个念头:“快到朱鸿兴去吃头汤面!”这句话需要作一点讲解,否则的话只有苏州人,或者是只有苏州的中老年人才懂,其余的人很难理解其中的诱惑力。

那时候,苏州有一家出名的面店叫作朱鸿兴,如今还开设在怡园的对面。至于朱鸿兴都有哪些个花式面点,如何美味等等我都不交待了,食谱里都有,算不了稀奇,只想把其中的吃法交待几笔。吃还有什么吃法吗?有的。同样的一碗面,各自都有不同的吃法,美食家对此是颇有研究的。比如说你向朱鸿兴的店堂里一坐:“喂!(那时不叫同志)来一碗××面。”跑堂的稍许一顿,跟着便大声叫喊:“来哉,××面一碗。”那跑堂的为什么要稍许一顿呢,他是在等待你吩咐吃法的——硬面,烂面,宽汤,紧汤,拌面;重青(多放蒜叶),免青(不要放蒜叶),重油(多放点油),清淡点(少放油),重面轻交(面多些,交头少点),重交轻面(交头多,面少点),过桥——交头不能盖在面碗上,要放在另外的一只盘子里,吃的时候用筷子撩过来,好像是通过一顶石拱桥才跑到你嘴里……如果是朱自治向朱鸿兴的店堂里一坐,你就会听见那跑堂的喊出一大片:“来哉,清炒虾仁一碗,要宽汤、重青,重交要过桥,硬点!”

一碗面的吃法已经叫人眼花缭乱了,朱自治却认为这些还不是主要的;最重要的是要吃“头汤面”。千碗面,一锅汤。如果下到一千碗的话,那面汤就糊了,下出来的面就不那么清爽、滑溜,而且有一股面汤气。朱自治如果吃下一碗有面汤气的面,他会整天精神不振,总觉得有点什么事儿不如意。所以他不能像奥勃洛摩夫那样躺着不起床,必须擦黑起身,匆匆盥洗,赶上朱鸿兴的头汤面。吃的艺术和其他的艺术相

同,必须牢牢地把握住时空关系。

朱自治揉着眼睛出大门的时候,那个拉包月的阿二已经把黄包车拖到了门口。朱自治大模大样地向车上一坐,头这么一歪,脚这么一踩,叮当一阵铃响,到朱鸿兴去吃头汤面。吃罢以后再坐上阿二的黄包车,到阊门石路去蹲茶楼。

苏州的茶馆到处有,那朱自治为什么独独要到阊门石路去呢?有考究。那大茶楼上有几个和一般茶客隔开的房间,摆着红木桌、大藤椅,自成一个新天地。那里的水是天落水,茶叶是直接从洞庭东山买来的;煮水用瓦罐,燃料用松枝,茶要泡在宜兴出产的紫砂壶里。吃喝吃喝,吃与喝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凡是称得上美食家的人,无一不是陆羽和杜康的徒弟的。

朱自治登上茶楼之后,他的吃友们便陆续到齐。美食家们除掉早点之外,决不能单独行动,最少不能少于四个,最多不得超过八人,因为苏州菜有它一套完整的结构。比如说开始的时候是冷盆,接下来是热炒,热炒之后是甜食,甜食的后面是大菜,大菜的后面是点心,最后以一盆大汤作总结。这台完整的戏剧一个人不能看,只看一幕又不能领略其中的含意。所以美食家们必须集体行动。先坐在茶楼上回味昨天的美食,评论得失。第一阶段是个漫谈会。会议一结束便要转入正题,为了慎重起见,还不得不抽出一段时间来讨论今日向何方?是到新聚丰、义昌福,还是到松鹤楼。如果这些地方都吃腻了,他们也结伴远行,每人雇上一辆黄包车,或者是四人合乘一辆马车,浩浩荡荡,马蹄声碎,到木渎的石家饭店去吃鲃肺汤,枫桥镇上吃大面,或者是到常熟去吃叫花子鸡……可惜我不能把苏州和它近郊的美食写得太详细,深怕会因此而为苏州招来更多的会议,小说的副作用往往难以料及。

二、与我有涉

如果朱自治仅仅自我吃喝而与我无关的话,我也不会那么强烈地厌恶他。他当他的美食家,我当我的穷学生,本来是能够平安相处的。

可是我在前面的一节中只说到朱自治吃早点,吃中饭,他还有一顿晚饭没有吃呐!

朱自治吃罢中饭以后,便进澡堂去了。他进澡堂并不完全是为了洗澡,主要是找一个舒适的地方去消化那一顿丰盛的筵席。俗话说饿了打瞌睡,吃饱跑勿动。朱自治饱食一顿之后双脚沉重,头脑昏迷,沉浸在一种满足,舒畅而又懒洋洋的神仙境界里。他摇摇晃晃地坐上阿二的黄包车,一阵风似的拉到澡堂里,好像是到医院里挂急诊似的。

朱自治进澡堂只有举手之劳,即伸出手来撩开门帘。门帘一掀,那坐账台的便高声大喊:“朱经理来哉!”天晓得,朱自治哪一天当过经理的,对资本家应该喊一声老板才对。不过,老板这种尊称那时已经不时髦了。一是缺少点洋味,二是老板有大有小,开爿夫妻老婆店也能叫作老板的。经理就不同了,洋行经理,公司经理,买卖大,手面阔,给起小账来绝不是三块两块的,五十元的关金券用不着找零头!所以那跑堂的一听到朱经理来哉,立刻有两个人应声而出,一边一个,几乎是把个朱自治抬到头等房间里。这头等房间也和现在的高级招待所有点相似,两张铺位,一个搪瓷澡盆,有洗脸池,有莲蓬头。只是整个的面积较小,也没有空调设备。不碍,冬天有蒸气,夏天有一只华生老牌的大吊扇,四块木板在头顶上旋个不歇。

朱自治向房间里一坐,就像重病号到了病房里,一切都用不着自己动手。跑堂的来献茶,擦背的来放水,甚至连脱鞋也用不着自己费力。朱自治也不愿费力,痴痴呆呆地集中力量来对付那只胃,他觉得吃是一种享受,可那消化也是一种妙不可言的美,必须潜心地体会,不能被外界的事物来分散注意力。集中精力最好的方法是泡在温水里,这时候四大皆空,万念俱寂,只觉得那胃在轻轻地蠕动,周身有一种说不出的舒坦和甜美,这和品尝美食有异曲同工之妙,但是二者不能相互代替。他就这么四肢不动,两眼半闭地先在澡盆里泡上半个钟头。泡得迷迷糊糊、昏昏欲睡的时候,那擦背的背着一块大木板进来了。他把朱自治从澡盆里拉出来,把木板向澡盆上一盖,叫朱自治躺上“手术台”,开始了他那擦背的作业。读者诸君切不可把擦背二字作狭义的理解,好像

擦背就是替人擦洗身上的污垢。不对，朱自治天天一把澡，有什么可擦的？这擦背对他来说实在是一种古老的按摩术，是被动式的运动。饭后百步走被认为是长寿之道，但是奉行此道者需要自己迈开双腿。擦背则不同，只消四肢松弛地躺在“手术台”上，任人上摩下擦，伸拳屈腿，左转右侧，放倒扶起，同样收到运动的功效，却用不着自己花力气。真正的美食家必须精通消化术，如果来个食而不化，那非但不能连续工作，而且也十分危险！

朱自治的此种运动时间也不太长，大体上不超过半个钟头。然后便在卧榻上躺下，开始那一整套的繁文缛节，什么捏脚、拿筋、敲膀、捶腿。这捶腿是最后的一个节目，很可能和催眠术有点关系，朱自治在轻轻地拍打中，在那清脆而有节奏的响声中心旷神怡，渐渐入睡。这一觉起码三个钟头，让那胃中的食物消化干净，为下一顿腾出地位。

当朱自治快要醒来时，我也从学校里下学归来。书包一放，妈妈便来关照：

“今天还在元大昌，快去！”

妈妈的话只有我懂，那朱自治还有一顿晚饭没有吃呐！

朱自治吃晚饭也是别具一格，也和写小说一样，下一篇绝不能雷同于上一篇。所以他既不上面馆，也不上菜馆，而是上酒店。中午的一顿饭他们是以品味为主，用他们的术语来讲叫“吃点味道”。所以在吃的时候最多只喝几杯花雕，白酒点滴不沾，他们认为喝了白酒之后嘴辣舌麻，味觉迟钝，就品不出那滋味之中千分之几的差别！晚上可得开怀畅饮了，一醉之后可以呼呼大睡，免得饱尝那失眠的苦味，因此必须上酒店。

苏州的酒店卖酒不卖菜，最多备有几碟豆腐干，兰花豆，辣白菜之类。孔乙己能有这些便行了，君子在酒不在菜嘛。美食家则不然，因为他们比君子有钱，酒要考究，菜也是马虎不得的。既不能马虎，又不能雷同，于是他们便转向苏州食品中的另一个体系——小吃。提到苏州的小吃我又不愿多写了，除掉如前所述的原因外，还因为它会勾起我一段痛苦的回忆，我被一个我所厌恶的人随意差遣！

苏州的小吃不是由那一片店经营的,它散布在大街小巷,桥堍路口。有的是店,有的是摊,有的是肩挑手提沿街叫卖的。如果要以各种风味小吃来下酒的话,那就没有一个跑堂的能对付得了,必须有个跑街的到四下里去收集。也许是我的腿长吧,朱自治便来和我妈商议:

“你家高小庭蛮机灵,阿好相帮我做点事体,我也勿会亏待伊。”

妈妈当然答应罗,她住了人家的房子不给钱,又没有什么家务可料理,心里老是过意不去,巴不得能为朱自治做点事,以免良心受责备。可怜的妈妈不知道剥削二字,只承认一切现存的社会法规。她教育儿子不能好吃,却对朱自治的好吃不加反对,她认为那是一种“吃福”,好吃与吃福是两回事体。可我却把它当作一回事,怎么也不愿意去替朱自治当跑街的。堂堂的一个高中生怎么能去给一个好吃鬼当小厮呢!

妈妈又哭了,父亲谢世后家境贫困,是靠我的大哥当远洋水手挣点钱:“去吧小庭,我们头顶人家的天,脚踏人家的地,住了人家的房子不出房租,又不交水电费,算起来相当于全家的伙食费。只要朱经理说个不字,你就念不成书,我们一家就会住在露天里。只怪你爸爸走得早啊,我求求你……”

我只好忍辱负重了,每天提着个竹篮去等候在酒店的门口。等到华灯初上,霓虹灯亮满街头的时候,朱自治和他的吃友们坐着黄包车来了。一长串油光锃亮的黄包车,当当地响着铜铃,哇哇地揪着喇叭,像游龙似的从人群中夺路而来,在酒店门口徐徐地停下。他们一个个洗得干干净净,浑身散发着香皂味,满面红光,春风得意。朱自治的黄包车总是走在前面,车夫阿二也显得特别健壮而神气。阿二替朱自治掀掉膝盖上的毡毯,朱自治一跃落地,轻松矫捷。在酒店门口迎接他们的不是老板,也不是跑堂的,而是两排衣衫槛褛,满脸污垢,由叫花子组成的仪仗队。乞丐们双手向前平举,嘴中喊着老爷,枯树枝似的手臂在他的左右颤抖。朱自治似乎早有准备,手一扬,一张小票面的钞票飞向叫花子头:“去去。”

叫花子呼啦一声散开,我这个手提竹篮,依门而立,饥肠辘辘的特殊叫花子便到了朱自治的面前。这个叫花子所以特殊,是因为他知道

一点地理历史,自由平等,还读过三民主义;他反对好吃,还懂得人的尊严。当叫花子呼啦一声散开而把我烘托出来的时候,我满腔怒火,汗颜满面,恨不得要把手中的竹篮向朱自治砸过去!可是我得忍气吞声地从朱自治的手中接过钞票,按照他的吩咐到陆稿荐去买酱肉,到马咏斋去买野味,到采芝斋去买虾子鲞鱼,到某某老头家去买糟鹅,到玄妙观^①里去买油氽臭豆腐干,到那些鬼才知道的地方去把鬼才知道的风味小吃寻觅……

我提着竹篮穿街走巷,苏州的夜景在我的面前交替明灭。这一边是高楼美酒,二簋西皮,那霓虹灯把铺路的石子照得五彩斑斓;那一边是街灯昏暗,巷子里像死一般的沉寂,老妇人在垃圾箱旁边捡菜皮。这里是杯盘交错,名菜陆陈,猜拳行令;那里却有许多人像影子似的排在米店门口,背上用粉笔编着号码,在等待明天早晨供应配给米。这里是某府喜事,包下了整个的松鹤楼,马车、三轮车、黄包车在观前街上排了一长溜。新娘子轻纱披肩,长裙曳地,出入者西装革履,珠光宝气;可那元妙观的廊沿下却有一大堆人蜷缩在麻袋片里,内中有的人也许就看不到明天……“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这句众所周知的诗句常在我的头脑里徘徊。

朱自治倒是不肯亏待我,常常把买剩的零钱塞在我的口袋里:“拿去!”那神情和给叫花子是差不多的。

我睁眼、僵立。感到莫大的侮辱。

“拿去吧,是给你奶奶买肉吃的。”

侮辱被辛酸融化了。我是有个老祖母,是她把我从小带大的,那时已经七十六岁,满嘴没牙,半身不遂,头脑也不是那么清楚的。可是她的胃口很好,天天闹着要吃肉,特别是要吃陆稿荐的乳腐酱方,那肉入口就化,香甜不腻。她弄不清楚物价与货币的情况,在她的头脑中一切都是以铜板和银元计算的。她只知我的哥哥每月要寄回来几千块钱(能买一百多斤米),为什么不肯花二十六个铜板给她称一斤肉回来

① 苏州玄妙观亦称元妙观。

呢？三百个铜板才合一块钱！她把这一切都归罪于我的妈妈，骂她忤逆不孝，克扣老人，而且牵牵连连地诉述着陈年八代的婆媳关系，一面骂一面流眼泪。妈妈怎么解释也没用，只好一面在配给米里捡石子，一面把眼泪洒在淘米箩里。我在这两条泪河之间把心都挤碎！

当我用朱自治的零钱买回几块肉来，端到奶奶的床前时，她一面吃，一面哭，一面用颤巍巍的手抚摸着我的头：“好孙子，还是你孝顺，奶奶没有白带你……”

我一听这话眼泪便簌簌地往下流，我想大哭，大喊，想问苍天！可是我拼命地哽住喉咙，俯伏在奶奶的床头，把头埋在棉被里。既然在侮蔑中把钱接过来了，为什么不能让奶奶得到一点安慰！

“上有天堂，下有苏杭”啊！这句老话不知道是谁发明的，而且大言不惭地把苏州放在杭州的前面。据说此种名次的排列也有考究，因为杭州是在南宋偏安以后才“春风熏得游人醉，错把杭州作汴州”。而苏州在唐代就已经是“十万夫家供课税，五千子弟守封疆”了。到了明代更是“翠袖三千楼上下，黄金十万水东西”。近百年间上海崛起，在十里洋场上逐鹿的有识之士都在苏州拥有宅第，购置产业，取其进可以攻，退可以守。苏州不是政治经济的中心，没有那么多的官场倾轧，经营的风险；又不是兵家的必争之地，吴越以后的两千三百多年间，没有哪一次重大的战争是在苏州发生的；有的是气候宜人，物产丰富，风景优美。列代的地主官僚，富商大贾，放下屠刀的佛，怀才不遇的文人雅士，人老珠黄的一代名妓等等，都欢喜到苏州来安度晚年。这么多有钱有文化的人集中在一起安居乐业，吃喝和玩乐是不可缺少的，这就使苏州的园林可以甲天下，那吃的文化也是登峰造极！风景不能当饭，天天看了也乏味，那吃却是一日三顿不可或少的。苏州所以能居于天堂之首，恐怕主要是因为它的美食超过了杭州。这也许是苏州人的骄傲吧，可我那时简直觉得这是一种罪恶，是人间最最不平的表现！我不知道地狱里可有“天堂”，可我知道“天堂”里确有地狱，而且绝大多数的人都在地狱的边缘上徘徊。说老实话，当我开始信仰共产主义的时候，我没有读过《资本论》，也没有读过《共产党宣言》，多半是由朱自治他们

促成的；他们使我觉得一切说得天花乱坠的主义都没有用，只有共产才能解决问题！如果共掉了朱自治的房产，看他还神气不神气！

我偷偷地唱着一支从北平传来的歌：

山那边呀好地方，
穷人富人都一样，
你要吃饭得做工呀，
没人为你作牛羊。

.....

这支歌的曲调很简单，唱起来也用不着尖起嗓门儿费死力，可它却使我从“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中找到了出路，出路就在山那边！

我决定到解放区去了，那已经是一九四八年的冬天。我不知道解放区的形势，总以为国民党还很强大，还有美国的原子弹什么的。无产阶级要夺取全国胜利，恐怕还要经过几年、几十年的浴血奋斗！我读过《铁流》与《毁灭》，知道革命的艰难困苦，知道那是血与火的洗礼。所以当时的心情很悲壮，准备去战死沙场。“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当时的心情很有点像荆轲离别高渐离。

我的高渐离便是苏州，是这个美丽而又受难的城市叫我去战斗！临行之前我上了一趟虎丘山，站在虎伏阁上把这美丽的城市再看一遍：再见吧，你的儿子将用血来洗尽你身上的污垢！傍晚，我照样去替朱自治买小吃，照样买了一块乳腐酱方送到奶奶的床前：吃吧，奶奶，孙子从屈辱中接过钱来为你买肉，这恐怕是最后的一回！我的判断没有错，当奶奶发觉最孝顺的孙子失踪之后，她哭喊了三天便与世永别。

年轻时的记忆多么深刻啊！“文化大革命”期间的挂牌、游街、屈辱、受罪如今已经淡忘了，仿佛那是一场不屑一顾的游戏。可是三十多年前离家别井，暗中告别亲人，向着黑暗猛冲的情景却点滴不漏地保存在记忆里。也许我是欢喜记着光荣而忘掉屈辱吧，可又为什么不把三四十年前的屈辱也忘记？每当我在电影或电视中看到受伤的战士从血

泊中爬起来,举起枪,高喊着报仇的口号向敌人猛扑过去的时候,我的心便会向下一沉,两眼含着泪水。虽然这种镜头看得太多了也觉得老一套,可是这种话我不许孩子们说,孩子们一说我就要骂:“小赤佬,你懂什么东西!”

三、快乐的误会

没想到我进入解放区已经太晚了,淮海战场上的硝烟已经消散,枪炮声已经沉寂。解放区的军民沉浸在欢乐的高潮中,准备打过长江去!我们这些从蒋管区去的学生被半路截留,被编入干部队伍随军渡江去接管城市。我从苏州来,当然应该回到苏州去,因为我熟悉那里的大街小巷以及那种好听而又十分难懂的语言,带个路也方便。至于回到苏州去干什么,谁也没有考虑,如果那时有人提出什么前途、专业、工资、房子等等,我们这一伙“小资产”便会肯定他是国民党派来的!革命就是革命,干什么都可以,随便。我们的组织部长却不肯随便,一定要根据各人的特长和志趣来分配,因此就出现了十分快乐的场面:

组织部长把我们二十多个学生兵招集到一个祠堂里。祠堂的正中摆着方桌,桌上放着档案和纸笔,二十多人分坐在两边。

组织部长是个大知识分子,早年毕业于交通大学的机械系。他对我们这些小知识分子十分熟悉:“现在要给大家分配工作了,组织上尽量照顾各人的特长和志愿,希望你们在回答问题之前好好地考虑,分定之后就不许犯自由主义。”

当时的气氛本来很严肃,却被我的老同学,浑号叫丁大头的人弄得豁了边。丁大头的头其实也不大,可是他的知识很广博,天文、地理、历史、哲学他样样都懂一点。因为他的脑子里包容的东西太多,所以看起来他的头好像比平常的人大了点。他第一个被部长叫起来:

“你想干什么呢?”

“随便。”丁大头回答得很爽气。

部长翻了翻眼睛:“随便是个什么东西?说得具体点。”

“具体点……那也随便。”

人们哄堂大笑了：“他什么都懂，可以随便！”

部长也笑了，翻翻档案：“什么都懂的人到什么地方去呢？……我问你，你对什么东西最感兴趣？”

“看书。”

“那你为什么不早说呀，到新华书店去。”

丁大头被一句定终身，后来在某地的新华书店当经理，而且是个很称职、很懂行的经理。

第二个被叫起来的是个女同学，苏州姑娘，长得很美，粗布的列宁装和八角帽使得她在秀丽中透出矫健的气息。

部长向她看了一眼便问：“你会唱歌吗？”

“会。”

“来一段《白毛女》试试。”

“北风那个吹……”女同学拉开嗓子便唱。那时我们天天唱歌，谁也不会扭捏。

“好了，好了，到文工团去！”

这位女同学的命运也不坏，文化大革命前唱民歌，很有点名气。如今听不见她唱了，这小老太婆也可能是在哪里教徒弟。

轮到我的时候便糟了，我怎么也想不起最欢喜什么，除掉反对好吃之外，我好像对什么都欢喜。我没有任何特长，连唱起歌来都像破竹子敲水缸。

部长等得不耐烦了：“难道你一样事情都不会干？”

“会会，部长，我会替人家买小吃，熟悉苏州的饮食店。”我绝不能承认万事不通呀，可这一通便出了问题！

“挺好，干商业工作去，苏州的食品是很有名的。”

“不不，部长，我对吃最讨厌！”

“你讨厌吃？很好，我关照炊事班饿你三天，然后再来谈问题！下一个……”

完了，命运在一阵哄笑声中决定了。可我当时并不懊丧，也不想犯

自由主义,扬子江在怒号,南岸的人民在呼喊,要拯救劳苦大众于水深火热之中,要推翻那人吃人的旧社会;再也不能让朱自治他们那种糜烂的寄生虫式的生活延续下去!朱自治呀,朱自治,这下子可由不得你了。我们绝不会让你饿肚子,至少得让你支起个炉灶来烧东西。也不能老是让阿二拉着你,你自己有两只脚,应该是会走路的。

风萧萧兮江水寒,壮士一去兮又复还。我又回到苏州来了,几经转折之后又住在朱自治的门前。朱自治对我刮目相看了,他称我同志,我喊他经理;他老远便掏出三炮台香烟递过来,我连忙摸出双斧牌香烟把它挡回去。别跟我来这一套,你那高级烟浸透了人民的血汗,抽起来有股血腥味。朱自治在解放之初有点儿心虚,深怕共产党会把他关进监牢,那牢饭可不是好吃的!

隔了不久,朱自治便镇静自若了,因为我们取缔妓女,禁大烟,反霸,镇反,一直到三反五反都没有擦到他的皮。他不抽大烟不赌钱,对妓女更无兴趣,除掉好吃之外什么事儿也没有干过。镇反挨不上他,他不开工厂不开店,谈不上五毒俱全和偷税漏税。所以他经常竖起大拇指对我说:“共产党好,如今没有强盗没有小偷,没有赌场没有烟铺,地痞、流氓、妓女都没有了,天下太平,百姓安定,好得很!”他说的可能是真话,可我把他上下打量,心里想,你为什么不说没有赌吃嫖谣呢?赌和嫖你沾不上,吃和谣你是少不了的。等着吧,现在是新民主主义!

朱自治并没有消极地等待,还是十分积极地吃东西,照样坐着阿二的黄包车上面店,上茶楼,照样找到另一个人帮他跑街买吃的。

那时候我的工作很紧张,没有什么上下班的时间,也没有星期天,没早没晚地干,运动紧张的时候便睡在办公室里。可那朱自治比我还积极,我起床的时候他已经坐着黄包车走了;我睡得迷迷糊糊的时候才听见他的黄包车到了门前。他每逢到家的时候都要踩一下铃铛,那铜铃的响声在深夜的小巷里像打锣似的。他有时候也不回家,仲夏之夜吃饱了老酒,干脆就睡在公园的凉亭里,那里风凉,还有一阵阵广玉兰的香气。他渐渐地胖起来了,居然还有个肚子挺在前面。妈妈对他说:“朱经理,你发福了,人到了四十岁左右都会发胖的。”可他却说:

“不对,我这是心宽体胖。现在用不着担心那些强盗和流氓了,别看我有几个钱,从前的日子也是很难过的。生日满月,四时八节,我得给人家送礼,一不小心得罪了人,重则被人家毒打一顿,轻则被人家向黄包车上掷粪便。就说那个上饭店吧,以前也是提心吊胆的。有一次我们几个人吃得正高兴,忽然有个人走到我们的房间里来,要我们让座位。我不知道他是什么人,拌了几句嘴,结果得罪了流氓头子,被他的徒子徒孙们打了一顿,还罚掉了四两黄金的手脚钱!现在好了,那些家伙都看不见了,有的进了司前街(苏州的监狱所在地),有的到反动党团特登记处登了记,一个个都缩在家里。饭店里也清静得多了,人少东西多,又便宜,我吃饱了老酒照样可以在公园里打瞌睡,用不着防小偷!”朱自治拍拍小肚子:“你看,怎么能不发胖呢!”

我听了朱自治的话直翻眼,怎么也没有想到,革命对他来说也含有解放的意义!

当我深夜被朱自治的铃声惊醒之后,心头便升起一股烦恼,这苏州怎么还是他们的天堂?劳苦大众获得解放的时候,那寄生虫也会乘汤下面,养得更肥!我没有办法触动朱自治,可我现在有了公开宣传共产主义的权利,便决定首先去鼓动拉黄包车的阿二。

阿二住在巷子的头上,在那口公井的旁边。他和我差不多的年纪,却比我生得高大、漂亮、健壮。小时候我和他在巷子里踢皮球,皮球踢上房顶之后总是他去爬屋面。他的老家是苏北,父亲也是拉车的;父亲拉不动了才由儿子顶替。阿二每天给朱自治拉三趟,其余的时间可以另找生意。他的那辆车是属于“包车”级的,有皮篷,有喇叭,有脚踏的铜铃,冬春还有一条毡毯盖住坐车的膝头。漂亮的车子配上漂亮的车夫,特别容易招揽生意。尤其是那些赶场子的评弹女演员,她们脸施脂粉,细眉朱唇,身穿旗袍,怀抱琵琶,那是非坐阿二的车子不可。阿二拉着她们轻捷地穿过闹市,喇叭嘎咕嘎咕,铜铃叮叮当当,所有的行人都要向她们行注目礼;即使到了书场门口,阿二也不减低车速,而是突然夹紧车杠,上身向后一仰,嚓嚓掣动两步,平稳地停在书场门口的台阶前,就像上海牌的小轿车戛然而止似的。女演员抱着琵琶下车,腰肢摆

扭,美目流眄,高跟鞋橐橐几声,便消失在书场的珠帘里。那神态有一种很高雅的气派,而且很美。试想,如果一个标致的女演员,坐上一辆破旧的硬皮黄包车,由一个佝偻蹒跚的老人拉着,吱吱嘎嘎地来到书场门口,那还像个什么样子呢!人们由于在生活中看不到、看不出美好与欢乐,才甘心情愿地花了钱去向艺术家求教的。

由于上述的种种原因,所以那阿二虽然是拉黄包车,家庭生活还是过得去的。我去动员的时候,他们一家正在天井里吃晚饭。白米饭,两只菜,盆子里还有糟鹅和臭豆腐干,他的老父亲端着半斤黄酒在吱吱嘎嘎地。我寒暄了几句之后便转入正题:

“阿二,现在解放了,你觉得怎么样呢?”

阿二是个性情豪爽的人,毫不犹豫地说了他的体会:“好,现在工人阶级的地位高了,没有人敢随便地打骂,也没人敢坐车不给钱。”

我听了把嘴一撇:“唉呀,你怎么也只是看到这么一点点,工人阶级是国家的主人,决不是给人家当牛做马的!”

“我没有给人家当牛做马呀!”

“还没有,你是干什么的?”

“拉车。”

“好了,从古到今的车子,除掉火车与汽车之外,都是牛马拉的!”

“小板车呢?”

“那……那是拉货的,不是拉人的。人人都有两条腿,又没病又不残,为什么他可以架起二郎腿高坐在车子上,而你却像牛马似的奔跑在他的前面!这能叫平等吗?你能算主人吗?还讲不讲一点儿人道主义!”

阿二吸了口气:“唏,这倒是真的。”

阿二的爸爸叹了口气:“没有办法呀,他给钱。”

“钱……”我把钱字的音调拉了个高低,表示一种轻蔑:“你可知道朱自治他们的钱是从哪里来的?他们榨取了劳动人民的血汗,你拿了一点血汗之后又把他服侍得舒舒服服地!”

阿二的眉毛竖起来了:“可不,那家伙坐车很挑剔,又要快,又

怕颠。”

我趁热打铁了：“问题还不在于朱自治呐，我们年轻人的目光要放远点，你看人家苏联……”我滔滔不绝地讲起苏联来了，就和现在的某些人谈美国似的，“苏联的工人阶级，一个个都是国家的主人，不管什么事儿，没有他们举手都是通不过的。他们的工作都是开汽车，开机器，开拖拉机，没有一个是拉黄包车的。”我向阿二爸爸的酒杯也了一眼：“拉车弄几个钱也作孽，仅仅糊个嘴。人家苏联的工人都是住洋房，坐汽车，家里有沙发，还有收音机！半斤黄酒有什么稀奇，人家都喝伏特加哩！”我的天啊，那时我根本不知道伏特加是什么，若干年后才喝了几口，原来是像我们在粮食白酒里多加了点水！

阿二和他的爸爸更不知道伏特加了，他们听到这个名词还是第一回。那老头儿还咂咂嘴，他以为伏特加总是和茅台差不多的。

阿二也心动了：“哦……呃，那才有奔头。爸爸，我们也不要拉车了，你也当了一世的牛马啦！”阿二当然不是为了伏特加，我知道，他是想开汽车。那时候，年轻的人力车工人最高的理想便是当司机。

阿二的爸爸把酒杯向上一竖：“唏……快吃饭吧，吃完了早点睡，明天一早要去拉朱自治上面店。”白搭，我说了半天他等于没听见。老头儿的思想保守，随他去！

我抓住阿二不放，约他到我家来玩，继续对他讲道理，而且现身说法，拿自己作比：“你看我，高中毕业的时候，有个同学约我到西山去当小学教员，每月三担米，枇杷上市吃枇杷，杨梅上市吃杨梅，不要钱。还有个同学约我到香港去上大学，他的爸爸在香港当经理，答应每月给我八十块钱港币，毕业以后就留在他的公司里当职员。我为什么不去呐，人活着不都是为了吃饭，更不能为了吃饭就替资本家当马牛！”除了讲道理以外，我还借了一大堆《苏联画报》给他看，对他进行形象化的教育，说明我们青年人要为这么一种伟大的理想去奋斗。说实在，我所以能讲苏联如何如何，也都是从画报里看来的，画报总是美丽的！

阿二的觉悟果然提高了，也和他的父亲闹翻了，坚决不再拉车，另找职业。我在旁边使劲儿打气：“好，你这一步走得对，最好是进厂，当

产业工人去!”

隔了不久,阿二垂头丧气地来找我:“我把苏州都跑穿了,别说工厂啦,连饭店里都不收跑堂的!”

我连忙说:“千万要坚持,不能泄气。”

“气倒没有泄,可是肚皮不争气,没饭吃了!”

我听了也着急:“啊,这倒是个严重的问题,再克服一下,我去帮你想想办法。”

我给了阿二几个钱,立刻到民政局去找一位同志,他是和我一起渡江过来的。

那位同志一听就撇嘴:“你这位老兄毛里毛糙地,做事也不考虑考虑,现在有些资本家消极怠工,抽逃资金,不关门就算好的了,你还想到哪里去找职业?”

“好好,我检讨。可你总不能见死不救呀,想想办法吧。”

那位同志沉吟了一下:“这样吧,我正在搞失业工人登记,准备以工代赈,先解决他们的吃饭问题。”

以工代赈的项目是疏浚苏州城里的小河浜,这个工作很辛苦,但也很有意义。旧社会给我们留下了很多污泥浊水,我们要把浊水变清流,使这个东方的威尼斯变得名副其实,使这个天堂变得更加美丽,是我们革命的一个方面。

阿二听说这也是革命工作,二话没说,不讲价钱,天天去挖污泥,抬石头,工作比拉车辛苦几倍,但是每天只有三斤米。

阿二的爸爸也没有办法,为了吃饭,只好在门口摆起一个卖葱姜的小摊头。因为他家就住在公井的旁边,人们往往在洗菜的时候才发现忘了在菜场上买葱姜,所以生意还是不错的,只是那一碟糟鹅和半斤黄酒从此绝迹。那老头儿每天见到我时总是虎着眼睛把头偏过去。我的心里也有歉意,总是在暗中安慰着老头:“老伯伯,你别生气,总有一天会喝上伏特加的!”我把老头儿的虎眼当作一根鞭子,每天抽一下自己:“下劲儿干,争取社会主义的早日胜利!”每当我深夜拖着沉重的双腿走过这空寂无人的小巷时,都要看一看阿二家的窗口,默默地叨念:

“老伯伯,我高小庭总算对得起你,我没有怕苦,也没有怕累,我和你家阿二都在为明天而奋斗!”

为了阿二的事情,妈妈可生了我的气:“你这个不识好歹的东西,朱经理哪一点亏待过我们?人家花钱坐车碍你个屁事呀,你硬要和人家作对,弄得阿二家衣食不周,弄得朱经理出入不便,早晚都要街上去叫车,有时候淋得像个落汤鸡,你这个缺德的东西!”

我绝不和妈妈争辩,解放以后再也不能让她流眼泪。何况她的道德观点和我也没法统一,她还相信三从四德,还认为京戏里的那种老家奴十分了不起。只是我听了妈妈的责骂以后,再也不敢去鼓动那个为朱自治跑街的了,那人是个老头,抬不动石头。

朱自治对我也有感觉了,再也不喊我高同志,再也不请我抽香烟,在门口碰到我时便把头一低,擦身而去。看不出他的眼神,不知道他对我是恨呢,还是忌?不管怎么样,他的手里总算有了一样东西,一个草提包,包里有双套鞋,包口上横放着一把洋伞。他黎明出门时估不透天气,所以都带着雨具,以免叫不到车时淋成落汤鸡。我看了暗中高兴:“你迟早得自食其力,应该一样样地学会。”

四、鸣鼓而攻

也许是组织部长在我的档案里写了点什么,所以我的工作转来转去都离不开吃的。全行业公私合营的时候派不出那么多的公方代表,我也只好滥竽充数,被派到某个有名的菜馆里去当经理。

这个菜馆我很熟悉,但在解放前从来没有进去过,只是在门口看见有许多阔绰的人进进出出,看见有许多叫花子围在门前,看见那橱窗里陈列着许多好吃的东西,在霓虹灯的照耀下使人垂涎欲滴。我读过安徒生的童话《卖火柴的女孩》,总觉得那卖火柴的女孩就是死在这个菜馆的橱窗前。我进店的时候正是冬天,天也常常飘雪,早晨踏着积雪跑到店门口时,我的心便突然紧缩,深怕真的有个卖火柴的女孩倒在那里,火柴盒儿撒满了一地。

我在店里也坐不稳,特别看不惯那种趾高气扬和大吃大喝的行为。一桌饭菜起码有三分之一是浪费的,泔脚桶里倒满了鱼肉和白米。朱门酒肉臭倒变成是店门酒肉臭了,如果听之任之的话,那我还革什么命呢!

我首先发动全体职工讨论,看看我们这种名菜馆究竟是为谁服务的?到我们店里来大吃大喝的人,到底有多少是工人农民,有多少是地主官僚和资产阶级!用不着讨论,这不过是一种战斗的动员而已。每个职工都很清楚,农民根本不敢到我们的店里来,他们一看那富丽堂皇的门面就害怕,不知道一顿要花几石米!还不如到元妙观里去坐小摊,味道也不错,最多三毛钱。工人一生之中能来几回?除非他有特殊的事体。可是谁都认识朱自治,都知道他们的吃法和口味。每一个服务员都背得出一大串老吃客的名单,在那长长的名单中没有一个是无产阶级。其中有几个高级职员成分难以划定,据老跑堂的张师傅反映,他们有的是老板的亲戚,有的是老板手下的红人,而且都有股份。当然,每天来吃的人并不全是老顾客,你也不能叫所有的吃客都填登记表,写明前六项。可是,老的服务员对判断吃客的身份都很有经验,他们能从衣着、举止、神态,特别是从点菜的路数上看得出,来者绝大部分都不是工人农民,至少曾经有过一段并非工农的经历。

实行对私改造的那段时间,资本家的心情并不全是兴高采烈,也不都想敲锣打鼓,有些人从锣鼓声中好像看到了世界的末日,纷纷到我们的店里来买醉。他们点足了苏州名菜,踞案大嚼,频频举杯。待到酒酣耳热时便掩饰不住了:“朋友们,吃吧,吃掉他们拖拉机上的一颗螺丝钉!”这话是一种隐喻,因为那时候我们把拖拉机当作社会主义的标志。一讲到社会主义的农业便是像苏联那样,大农场,拖拉机。“吃掉他们拖拉机上的一颗螺丝钉!”当然是对社会主义不满,气焰嚣张,语气也是十分恶毒的!

我把收集来的材料,再加上我对朱自治他们的了解,从历史到现状,洋洋洒洒地写了一份足有两万字的报告,提出了我对改造饭店的意见,立场鲜明,言词恳切,材料生动确凿,简直是一篇可以当作文献看待

的反吃喝宣言！

领导上十分欣赏我的报告，立即批准在本店试行，取得经验后再推向全行业。

我放手大干了！

首先拆掉门前的霓虹灯，拆掉橱窗里的红绿灯。我对这种灯光的印象太深了，看到那使人昏旋的灯便想起旧社会。我觉得这种灯光会使人迷乱，使人堕落，是某种荒淫与奢侈的表现。灯红酒绿的时代早已一去不复返了，何必留下这丑恶的陈迹？拆！

店堂的款式也要改变，不能使工人农民望而却步。要敞开，要简单，为什么要把店堂隔成那么多的小房间呢，凭劳动挣来的钱可以光明正大地吃，只有喝血的人才躲躲闪闪。拆！拆掉了小房间也可以增加席位，让更多的劳动者有就餐的机会。

服务的方式也要改变。服务员不是店小二，是工人阶级，不能老是把一块抹布搭在肩膀上，见人点头哈腰，满脸堆笑，跟着人家转来转去，抽下抹布东揩西拂，活像演京戏。大家都是同志嘛，何必低人一等，又何必那么虚伪！碗筷杯盏尽可以放在固定的地方，谁要自己去取，宾至如归嘛，谁在家里吃饭时不拿碗筷呀，除非你是当老爷！

以上的三项改革，全店的职工都没有意见，还觉得新鲜，觉得是有了那么一点革命的气息。可是当我接触到改革的实质，要对菜单进行革命时就不那么容易了。

我认为最最主要的是对菜单进行改造，否则就会流于形式主义。什么松鼠桂鱼、雪花鸡球、蟹粉菜心……那么高贵，谁吃得起？大众菜，大众汤，一菜一汤五毛钱，足够一个人吃得饱饱地。如果有人还想吃得好点，我也不反对，人的生活总要有变化，革命队伍里也常常打牙祭，那只是一脸盆红烧肉，简单了点。来个白菜炒肉丝、大蒜炒猪肝、红烧鱼块、青菜狮子头（大肉圆）……够了吧，哪一个劳动者的家里天天能吃到这些东西？

反对的意见纷纷而来，而且都是从老年职工那里来的。

跑堂的张师傅反对了。他说话有点嬉不溜溜地：“啊哈，这下子名

菜馆不是成了小饭铺啦！高经理，索性来个彻底的改革吧，每人发两块木板，让我们到火车站去摆荒饭摊。”

我听了把眼睛一抬：“同志，有意见可以提，态度要严肃点，这是革命工作，不是和吃客们打哈哈的！”我知道他和资产阶级的老爷太太们周旋了几十年，说话不上路，所以特地点了他一点。

“好好，没意见，这样做我们也可以省点力。”张师傅服了。

管账的也提意见了：“高经理，我的意见也可能不正确，只是我有点担心……喏，这样做当然是对的了，可那赢利是不是会有问题？”他说起话来咿咿缩缩，因为他和原来的老板是亲戚，三反五反时曾经擦破点皮。

“你的担心我也考虑过，可是社会主义的企业是为人民服务，绝不能像资本家那样唯利是图！”

“对对，对对对。”管账的马上服帖。

死不服帖的是那几位有名的厨师，如果用现在的职称来评定的话，他们不是一级便是二级。他们可以著书立说，还可以到外国去表演。可我那时并没有把这种宝贵的技术放在眼里，他们也可能没有把我这样的外行放在眼里，特别是那个杨中宝，好像我剜了他的肉似的：

“这不是都卖点儿家常便饭了吗？”

“家常便饭有什么不好呀？”

“家常便饭家家会做，何必上饭店？”

“出门的人哪有背着锅子走路的？”

“出门的人都想尝尝天下的名菜，噢，苏州的名菜就是红烧狮子头？”

“那要看是什么人？”

“什么人都有，包括像你这样的干部在内！”

“我出差每天三毛钱伙食，两毛钱伙补，一顿吃掉五毛钱，还有早晚两顿没有着落哩！”

“不是所有的人都和你一样，他们自己贴。”

“贴，拿什么贴？不少人就是因为出差时嘴馋，才贪污了公款。”

“如果人家请客呢?”

“为什么要请客,拉拉扯扯的。三反五反的教训还不够吗?不少人被资本家拉下水,就是从请客吃饭开始的,说不定那些见不得人的勾当,就是在我们楼上的小房间里干出来的!”

“人家结婚呢?”

“结婚更不能铺张浪费,买几斤糖,开个联欢会,我们机关里就是这样干的。”

杨中宝火了:“高经理,你说的都是外行话,机关是机关,饭店是饭店。请你把我调到机关里去当炊事员吧,保证没意见!”

我看着杨中宝直翻眼,把到了嘴边的话咽回去。我不能对一个老工人发脾气,他的工龄和我的年龄差不多,是地地道道的无产阶级,而我本人的成分是学生,属于小资产阶级,再怎么革命也是革不掉的,只好暂时忍耐一点。何况他们所以反对也有道理,因为这一改他们就没有用武之地了。白菜炒肉丝不需要什么高超的手艺,连我都会……是呀,他们的技术不能发挥,也很可惜。调到机关里去当炊事员虽然是气话,调到交际处去当炊事员倒是很合适的……

会场沉寂。

我要设法打开僵局,目光便向青年人投射过去。那时候我已懂得,如果遇事打不开局面,最好是鼓动青年人起来带头。他们不保守,有闯劲,闯过了警戒线也无妨,然后再向回拉一点。矫枉必须过正,也许就是这个道理。

“青年同志们谈谈嘛,你们也是店里的主人,未来是属于你们的,谈谈。”

年轻的职工们只是笑,看看老师傅又看看我,两边都为难,一时拿不定主意。内中有个小伙子,名字叫做包坤年,跑堂的,虽然还没有满师,讲话却是很有水平的:

“同志们,我们的店必须改革,必须彻底地改革!再也不能为那些老爷们服务了,要面向工农兵。面向工农兵绝不是一句空话,要拿出菜单来作证明。烧什么菜,就是为什么人。蟹粉菜心不仅工农兵吃不起,

而且还要跟着老爷们受罪！为什么，菜心都给他们吃了，菜帮子都到了工农兵的碗里！生炒鸡丁要用鸡脯，鸡头鸡脚都卖给拉黄包车的，这分明是对工农兵的瞧不起。农民进店来点只豆腐汤，有人竟然回生意：‘嘿，吃豆腐汤到元妙观去吧，那里的豆腐汤又好又便宜。’元妙观只卖豆腐脑，分明是捉弄乡下人的。要是朱自治他们来了就不得了，从堂口到厨房，都是忙得飞飞地。鱼要活的，虾要大的，一棵青菜剥剩了手拇指那么一点点……”

包坤年这么一带头，人们就跟着发表意见，纷纷揭露我们的浪费，以及重视筵席而看不起小生意。这些情况我以前都不了解，听了十分生气，把手指在桌面上敲敲：“你看，你们看，不改革怎么得了呢！”

跑堂的张师傅低头不语了，回掉农民的生意可能就是 he 干的。几个厨师也不讲话了。苏州名菜选料精细，浪费肯定是有的；围着朱自治之类的人转也不假，名厨要靠吃家，要靠他们扬名，要靠他们品出那千分之几的差别。最好能碰上孔夫子，孔子曰：“食不厌精，烩不厌细！”

改革方案就这么定下来了，包坤年是立了功的，他后来表现得也十分积极，我指向哪里他打向哪里。我也为他的进步创造了很多有利的条件。至于他在文化大革命中把我打得半死，那是后话，暂且不提……

我当时把全部精力都扑在改革上，每晚回家都在十一点之后。我改了店堂，换了门面，写了大红海报张贴街头，还向报馆里投了稿，标题是：名菜馆面向大众，大众菜经济实惠！

开张的那一天，景象是十分壮观的。老头老太结伴而来，还搀着小孙子、小妹妹。那些拉车的、挑担的、出差的，突然之间都集中到店门口。门前的黄包车，三轮车，马车停了一长溜。这种车水马龙的情景解放前我也曾见过，可那是拉着老爷太太们来的；老爷太太们美酒高楼，拉车的人却瑟缩在寒风里。如今瑟缩的人们都站起来了，昂首阔步地进入店堂，把楼上楼下两个像会场似的堂口都挤得满满的。一时间板凳桌子乒乓响，人声鼎沸如潮水，看起来有点混乱，可那气氛实在热烈！服务员上菜也很迅速，大众菜，大众汤都用不着现做，汤装在木桶里，菜装在大锅里，一勺一大碗，川流不息地送出去。店门口的行人要靠右

走,进去连成两条线,如果用门庭若市来形容,那是十分贴切的。

朱自治和他的吃友们居然也来了,很好,我倒要看看你们今天想吃点什么东西!谁知道他们先在门口看看广告,再到店堂里瞧瞧热闹,俯下身去看看大众菜,鼻子噙了那么几噙,然后带着不屑一顾的神情走出去,还相互拍拍打打地发笑哩!我见了义愤填膺:“反对吧,先生们,我改革的目标就是要叫你们反对!”

老头老太的反映可就不同了:“啊哟,以前只听说这家菜馆有名,越有名越不敢来,今天可算见了世面!”

挑菜的农民也说了:“这菜馆我以前来过几回,都是挑着青菜进后门,一直送到厨房里,从来不敢向店堂里伸头!”

多么深刻的写照呀,多么自豪的语言,人民的称赞使我忘记了疲劳,感动得心都发抖。不管将来的历史对我这一段的工作如何评价(放心,它无暇顾及),可我坚信,当时我绝无私心,我是满腔热忱地在从事一项细小而又伟大的事业!

当时,我们的领导也到了现场,看了也很满意,虽然秩序有点混乱,那也是前进中的缺点,要我们好好地总结提高,然后推向全行业。

五、化险为夷

这一下朱自治可就走投无路了!尽管我们的经验很难推开,许多名菜馆都是敷衍了事,弄几只大众菜放在橱窗里装装门面。可是风气一开那苏州名菜便走了味,菜名不改,价钱不变,制作却不如从前那么精细。朱自治有一张什么样的嘴啊,他能辨别出味差的千分之几哩!一吃便摇头,便皱眉,便向人家提意见。朱自治看错皇历了,这时候再也没有人把他当作朱经理,资本家三个字也不是那么好听的。有钱又怎么样,不许收小费,你爱吃便进来,嫌丑请出去,反正营业额的大小和工资没有关系。如果依了你朱自治的话,还要落得个为资产阶级服务的臭名气!

朱自治怎么受得了呀,他每吃一顿便是一阵懊丧,一阵痛苦,一阵

阵地胃里难过。每天都觉得没有吃饱,没有喝够,看到酒菜又反胃。他精神不振,毫无乐趣,整天在大街上转来转去,时常买些糕点装在草包里,又觉得糕点也不如从前,放在房间里都发了霉,被我的妈妈扫进垃圾堆。那个很有气派的小肚子又渐渐地瘪下去了。

有一天晚上,朱自治居然推门而入,醉醺醺站在我的面前:“高小庭,我……我反对你!”

资产阶级开始反扑了,这一点我早有准备:“请吧,欢迎你反对。”

“你把苏州的名菜弄得一塌糊涂,你你,你对不起苏州!”

“这是你的看法,菜碗没有打翻,一塌糊涂是谈不上的。是的,我对不起苏州的地主和资产阶级,对苏州的人民我可以问心无愧!”

“你你……你对不起我!”

“是的,应当对不起你,因为你自己也是资产阶级!”

“小庭啊,人可要凭点儿良心,这些年来我可没有亏待过你!”

朱自治语无伦次了,他竟然想揭下伤疤当膏药贴,这就惹得我火起:“朱经理,我是对不起你,也对不起你的朋友;你的朋友中有三个是地主,有两个是在反动党团特的册子上登过记的,还有三个是拿定息的,包括你自己在内。别以为定息可以拿到老,这资产阶级总有一天要被消灭的!”

朱自治吓了一跳,以为我们的政策又要改变。对他来说吃当然很重要,消灭却是性命攸关的。他的酒意消掉了一半,不由自主地向后退,掏出一根前门牌塞过来,被我用飞马牌挡回去。他乘势把香烟一叼,吸了一口:“该死,今天托人到常熟去买了一只叫花子鸡,味道还和从前一样,不免多喝了几杯,这就糊里糊涂地跑到你家来了。噢,我是从哪个门里进来的呢!”朱自治想夺门而走了。

“慢点!”

朱自治站住了。

“朱经理,如果我有什么地方对不起你的话,那就是我没有告诉你一句最要紧的话:你再也不能这样下去了,要逐步地学会自食其力!”

“是是,我一定铭记。”

从此以后,我很少碰到朱自治,他当然也不会再来向我表示反对。我对他倒是十分关心,常常向妈妈问起。妈妈说他也不清楚,经常不见朱自治回家,房间里一股霉味。我想,朱自治也许是去干什么了吧,吃是终身的必需,总不能是终身的职业。

隔了不久,包坤年来向我汇报——他经常向我汇报。

“不得了,杨中宝他们开地下饭店了,是专门为资本家服务的,每天晚上赚大钱!”

“可当真?”

“一点不假,是我亲眼看见的,地点就你家东面的五十四号里,天天晚上有许多资本家在那里聚会,杨中宝烧菜,一个妖里妖气的女人收钱!”

包坤年说得有根有据,我怎能不问不理?立刻到居民委员会去调查,找杨中宝来谈话,一问一查又找到了朱自治的踪迹。

朱自治开始隐退了,他对饭店失望之后,便隐退到五十四号的一座石库门里。这门里共有四家,其中一家的户主叫作孔碧霞。孔碧霞原本是个政客的姨太太,这政客能做官时便做官,不能做官时便教书,所以还有教授的衔头。苏州小巷里的人物是无奇不有的。据说,年轻时的孔碧霞美得像个仙女,曾拜名伶万月楼为师,还客串过《天女散花》哩!可惜的是仙女到了四十岁以后就不那么惹人喜爱了,解放前夕,那政客不告而别,逃往香港,把个孔碧霞和一个八、九岁的女儿遗弃在苏州。

孔碧霞年轻的时候打扮惯了,也可能是由于登过台的关系,所以举手投足、顾盼摆扭等等都讲究个形体美。讲究得过了分便变成矫揉造作、搔首弄姿;特别是在无姿可弄而要硬弄时便有点怪里怪气。苏州话骂人也不是那么好听的,人家暗地里叫她“干瘪老阿飞”。

朱自治一贯地不近女色,为什么突然之间和孔碧霞混到一起去呢?很简单,那孔碧霞烧得一手好菜!

孔碧霞数十年的风流生涯,都是在素手做羹汤中度过的。她丈夫的朋友都是政界、实业界、文化界的高雅得志之士,像朱自治这样的人

是休想登堂入室的。什么美食家呀,在他们看起来,朱自治只不过是个肉头财主,饕餮之徒,吃食癫皮。哪有一个真正考究吃的人天天上饭店?“大观园”里的宴席有哪一桌是从“老正兴”买来的?头汤面算得什么,那隔夜的面锅有没有洗干净呢!品茶在花间月下,饮酒要凭栏而临流。竟然到乱哄哄的酒店里去小吃,荷叶包酱肉,臭豆腐干是用稻草串着的,成何体统呢!高雅权贵之士,只有不得已时才到饭店里去应酬,挑挑拣拣地吃几筷,总觉得味道太浓,不清爽,不雅致。锅、勺、箴篱不清洗,纯正的味儿中混进杂味,而且总有那种无药可救的,饭店里特有的油烟味!朱自治念念不忘的美食,在他们看起来仅仅是一种通俗食物而已。他们开创了苏州菜中的另一个体系,这体系是高度的物质文明和文化素养的结晶,它把苏州名菜的丰富内容用一种极其淡雅的形式加以表现,在极尽雕琢之后使其反乎自然。吃之所以被称作艺术,恐怕就是指这一体系而言的。

孔碧霞的烹调艺术,就是得之于这一派的真传。她在当年的社交界是个极其有名的姨太太,会唱戏,会烧菜,还会画几笔兰花什么的。二十多年间她家的庭院里名流云集,两桌麻将让八个男人消遣,一桌酒席由她来做精彩的表演。她家有一个高级的厨娘,这高级的厨娘也只能当她的下手!

朱自治被逼得走投无路之后,偶尔听他的一位吃友谈起,说是五十四号里有个孔碧霞,此人当年如何如何,如何身怀绝技。

朱自治一听便笑了:“你老兄是说吃解馋的吧,好菜怎么能家里做呢。你没有那么多的佐料、高汤,没有那么大的炉火与油镬,办不成的。”

“不信?那也没有办法,我请不动那位尊神。她根本就不把我们这些人放在眼里。解放前我想尽办法也没有打得进去……对了,近几年来听说她的家境不好,手头拮据,也许看了孔方兄的面上,能为我们操办一席。你家和她靠近,去试试。”

朱自治病急乱投医了,他为了吃总会干出一些冒冒失失的事体;他冒冒失失地去敲五十四号的大门,径直说明来意。

如果是在解放前的话,孔碧霞不把朱自治赶出来才怪呐!可那孔碧霞不如朱自治,她没有那么多的存款和定息,已经把房子租给了三家,还得靠变卖家具和首饰度日。同时她也多年不操此道,有点技痒难熬,很想重新得到别人的称赞,再现昔日的风流。她内心已经许诺,表面上还要搭搭架子:

“啊呀,朱先生,僚(你)是听啊里(哪里)一位老先生活嚼舌头根,僚尼(我们)女人家会做啥格(什么)菜呢,从前辰光烧点小菜,是旡没(没有)事体弄弄白相(玩儿)格!”这女人的一口苏白像唱歌似的好听,可惜的是写出来却并不美观。

朱自治当然理解罗,涎皮搭脸地恳求着:“行行好吧,不管你办什么我们都吃,总归要比饭店里好点。”

“饭店!……”孔碧霞十分轻蔑地拉长了声音:“你们男人家真没出息,闻了饭店的那股味道之后居然还吃得下东西!”

朱自治目瞪口呆了,饭店里有什么味道?有的是美食的香味,闻了以后才胃大开哩!“啊,是是,我们这些人都是凡夫俗子,吃了一世什么也不懂,赏个光吧,让我们开开眼界。”

“好吧,那就献丑了,你们几个人呢?”

朱自治默算了一下,把食指一环:“九个。”

“不行,最多只能七个,人多是没好食的。”

“那就八个,正好一桌。”

孔碧霞笑了:“朱先生,你不懂规矩,那下手的一个位子是给烧菜的人留着的。”

“好好,对不起。”朱自治嘴里叫好,心里犯疑,哪有厨师上桌的?为了吃也只好迁就了,随即从身边掏出一叠钞票,数了五十元放在桌子上,心里盘算,这十块钱就算是小费。

孔碧霞面有难色了:“哎呀,这几个钱吃点什么呢?”

朱自治把心一横,八十块全部豁出去,买个面子。

孔碧霞迟疑了半晌,好像在那里算账,最后也了朱自治一眼:“好吧,不够的地方我也凑个份子。唉,你这人也实在可怜!”

事情就这样定下了,孔碧霞足足地准备了五天。据说还有一只红焖鳗没有来得及做,因为买回来的鳗鱼必须先用特殊的方法养一个星期,而那朱自治又馋得等不及。

至于这一顿到底吃了些什么,我没有参加,不能乱吹。

杨中宝是参加了的。那一天他正好休息,在大街上碰到了朱自治。朱自治是去通知他的吃友们准时上阵的,没想到有位老友因病不起,需要另找候补的。看见杨中宝便说:“走走,跟我去见见世面。”接着便把如何找到孔碧霞等等说了一遍。连说带吹,借以发泄对我们饭店的怨气。

杨中宝从来不服人,艺高人总有那么点傲气。名厨师都是男人,哪来这么个女的!可是他也听他师傅说过,在清末民初的时候,苏州有一种堂子菜,是从高等妓院里兴起来的。做这种菜的全是聪敏漂亮的女人,连丑丫头都不许帮道,那做工细得像绣花似的。他反正闲着没事,那朱自治又不用他出钱,何不趁此去见识见识,如果真有可取的话也可学点技术;如果言过其实的话也可把朱自治揶揄一顿,煞煞他的锐气!

杨中宝只向我讲了事情的来龙去脉,说明他没有开地下饭店,同时对这种捕风捉影的小报告十分恼火,说是有人和他过不去。他一气之下就不谈孔碧霞了,而是缠着我把他调到交际处去。这事儿很快就办成了,所以我一直不知道那天晚上孔碧霞如何大显身手,究竟吃了些什么稀世的美味!读者诸君也不必可惜,在往后的年月里我们还会见到她表演。文化大革命可以毁掉许多文化,这吃的文化却是不绝如流。

我当时只能从朱自治的行动上来进行推测,肯定那天晚上的一桌菜是“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哪得几回闻!”

朱自治一吃销魂,从此很少见到他的踪影。他再也不像没头苍蝇似的在街上乱转,再也听不到他清晨开门去赶朱鸿兴;他不食人间烟火了,一日三餐都吃在孔碧霞的家里。一个会吃,一个会烧;一个会买,一个有钱。两人由同吃而同居,由同居而宣布结婚,事情顺理成章,水到渠成。

朱自治终于成家了,一个曾经有过无数房屋的人,到了四十五岁上

才有了家庭！家庭是个奇妙的东西，他会使人变得有了关栏，言行举止也规矩了点。朱自治稳重些了，注意言谈，也注意外表。衣着和过去大不相同。笔挺的中山装，小口袋里插着两支钢笔，颇有点学者风度，这恐怕是孔碧霞参照她前夫的形象加以塑造的。

那孔碧霞不仅会烧菜，治家也是能手。结婚以后她千方百计地调整住房，让朱自治搬过去，把五十四号里的三户人家搬过来。三户人家的住房面积都有了扩大，她自己也不蚀本。因为那五十四号是个中式的庭院，有树木竹石，池塘小桥，空间很大，围墙很高，大门一关自成天地，任他们吃得天昏地黑也没人看见。那时候，像我这样的反吃战士比较多，还有反穿的；谁要是考究饭菜，讲究衣着，那就有被斥之为资产阶级的危险，或者说是和资产阶级的思想沾了边。所以有钱的人也不得不稍加隐蔽，关起门来吃，吃到肚子里谁也看不见！当然，完全看不见也不可能，人们每天早晨都看见朱自治夫妇上菜场。两个人穿着整齐，一个拎篮，一个拎包，一个人的膀子套在另一个人的膀子里，惹得行人侧目而视，哧溜一声：“干瘪老阿飞！”

我的妈妈从来不说孔碧霞的坏话，她认为这个女人是行了件好事，使得一个败子回头。她买菜回来常常对我说：“又碰到朱经理啦，现在变好了，夫妻两个亲亲热热，像个过日子的。”

我听了只是哼哼，心里想：这叫变好？这是关起门来逃避改造！

六、人之于味

朱自治逃避改造，我对他也无可奈何。他不到我们的店里来吃饭，我也不能冻结他在银行里的存款；说他有资产阶级的思想也白搭，他本来就是资产阶级。让他去吃吧，革命不是一次完成的，只要他规规矩矩，不再叫喊什么苏州菜不如从前，不再闯到我的房间里来提意见。

朱自治当然不会提意见罗，偶尔碰到我时也是陌若路人，头也不点，挺着那重新凸起来的肚子扬长而去，像个得胜的公鸡，气得我两肺直扇！

更为气愤的是居然有人和朱自冶唱着一个调子,说我们的饭店是名存实亡,饭菜质量差,花色品种少,服务态度恶劣!而且说这种话的人百分之九十以上都不是资产阶级。有干部,有工人,还有老头老太什么的。我听了很不服,改革才进行了一年多,你们怎么会从赞扬变成反对?两片嘴唇翻得倒快呐!我只好耐心地加以解释:

“老太太,少说两句吧,一年前你能到这里来吃饭,还算见了世面!”

“世面已经见过了,现在要吃好东西!”老太太晃着几张大钞票:“喏,儿子寄来的,他再三关照我要增加营养,高兴的时候便到你们店里来改善改善。改善个屁,还不如我自己烧的!”

“那就自己烧吧,自己烧的东西合口味。”我想起孔碧霞来了,不觉说漏了嘴。

老太太火了:“你……你这话像是开黑店的人说的,我能烧还要你们干什么,白养着你们拿薪水!”

包坤年挺身而出:“什么叫开黑店?你嘴里放干净点!社会主义的企业是黑店?你侮蔑……”

我连忙拦阻:“好了。算了算了。老太太,你别生气,这菜如果没有动过的话,我们退钱。”

对干部模样的人我就不大客气了:“同志,你是出差的吧?”

“对,咱从北京出差到苏州,听说苏州菜名扬四海,你们的店很有名气,特地来品尝品尝,可你们却拿出这玩意儿!”

“同志,有这样的玩意儿已经不错了,你的伙补一天才几毛钱?”

“咱自己就不能补?现在不是包干儿的时代了,咱花得起!”

“艰苦朴素的作风还得保持。”

“对对,谢谢您的教导,早知如此应该背一袋窝头上苏州,你们这家饭店嘛,存在也是多余的!”袖子一甩,走了。

我叹了口气,觉得这人的资产阶级思想也是很严重的,才拿了几天薪金制,就这么财大气粗地当老爷!至于我们这家饭店的存在……唉,确实有了点问题。这两年国民经济大发展,农村连年丰收,工人调资定

级,干部拿了薪水……那人民币又特别见花,肉才六毛多一斤,五香茶叶蛋五分钱一个,二两五的洋河大曲连瓶才两毛二分钱。许多人都阔绰起来了,看到大众菜便摇头,认为凡属“大众”都没有好东西,“劳动牌”也不是好香烟。我想为劳动大众服务,劳动大众却对我有意见。有人把意见放在桌面上,更多的人是不愿费口舌,反正有名的菜馆多的是,他们的改革本来就不彻底,临时弄点大众菜装装门面的。时过境迁连门面也不装了,橱窗里琳琅满目,各种名菜赫然在焉!他们乘着市面繁荣时拼命地掏人家的口袋,掏得人家笑嘻嘻地,那营业额像在寒暑表上哈热气,红线呼呼地升上去!我们也曾有过黄金时代啊!想那改革之初,营业额也曾一度上升,我还以此教育过管账的,说他是杞人忧天。隔了不久便往下降,降,降……降掉了三分之一,再降下去确实会产生能否存在的危机!

好吃的人们啊!当你们贫困的时候恨不得要砸掉高级饭店,有了几个钱之后又忙不迭地向里挤,只愁挤不进,只恨不高级。如果广寒仙子真的开了“月宫饭店”,你们大概也会千方百计地搭云梯!

一九五七年的春天是个骚动不安的季节,到处都在鸣放,还有闹事的。店里的职工开始贴我的大字报了,废报纸上写黑字,飘飘荡荡地挂在走廊里。我看了以后倒也沉得住气,无非是大众菜和营业额等等的问题。只有一张大字报令人气愤,说我是拿饭店的名声,拿职工的血汗来换取个人的名利,说那杨中宝是被我打击、排挤出去的!署名是“一职工”,可从那语气和那么多的形容词来看,肯定是包坤年写的。你这小子也太不应该了,当初改革时你也曾热情支持,说杨中宝开地下饭店也是你汇报的,怎么能把一堆屎都甩到我的头上来呢!当然,我也没有必要对此加以解释,只要有千分之一的正确性,都是应该接受的。

正当我惶惑不安,心情烦躁的时候,却来了我的老同学丁大头!

丁大头到北京开会,路过苏州,特地下车来看看我。转眼八年啦,真叫人想念!我情不自禁地叫起来:“老伙计,我要好好地请你吃一顿,走,上我们的饭店去!”我叫过以后也觉得奇怪,这话可不像我说的,怎么见了面就想请客呢!

丁大头摇摇头：“罢啦，你们的饭店我已经领教过了，还把大字报浏览了一遍。老伙计，你这些年都干了些什么呢？”

“干了点什么？等等，你等等。等会儿我会全部告诉你。”我连忙把我的爱人叫出来，向丁大头介绍：“喏，这就是我的爱人。这就是我常常对你说起的丁大头。”

丁大头欠了欠身子：“丁正，绰号大头……哎哎，这个雅号再也不能扩散了，我和你一样，大小也是个经理！”

我爱人掩着嘴笑，盯住丁大头看，好像要弄清楚那头是否比平常人大点。

我说：“你别呆看了，快到小菜场去看看，买点儿什么东西。”丁大头对我们的饭店已经领教过了，带他到人家的饭店里去更是制造口舌。所以我想叫爱人随便弄点菜，晚上就在家吃一点。

谁知道我的爱人没手抓了，结婚两年多她还没有弄过饭哩！她只会替丁大头倒茶、递烟。说：“你们先谈回儿吧，妈妈到居民委员会开会去了，等她回来再替你们准备吃的。”

我一听便急了，居民委员会开会是个马拉松，又拉又松，等到他们开完会，那小菜场肯定已经关门扫地。便说：“你就烧一顿吧，不能样样事情都依赖妈妈。”

我爱人来话了：“怎么，你把说过的话都忘啦，你说年轻人如果把业余时间都花在小炉子上，肯定不会有出息。”她把双手一摊：“你看，我这个有出息的人还不知道油瓶在哪里！”

丁大头哈哈地笑起来了：“对，我可以证明，这话肯定是他说的，一切后果由他负责！”

我连忙摆摆手：“好了，你到居民委员会去一趟，就说家里来了人，让妈妈早点儿拔签。”

爱人出去之后，我便滔滔不绝地倒苦水，从头说到尾：“……那些大字报你都浏览过了，进行人身攻击的不谈，那是一个年轻人跟着人家起哄的。可是我的改革有什么错？旧社会的情景你也见过的，就是为了消灭那种不平才去战斗。我不会忘记，临离开这个城市的时候我曾

经对她发过誓言。当然,那只是一种壮志,个人的力量是很微薄的,可是在我力所能及的范围内绝不能让那些污泥浊水再从阴沟里冒出来,绝不能让那些人还生活在他们的天堂里!他们可以关起门来逃避,但是不能让我们的同志在吃的方面去向资产阶级学习。当年我们遥望江南,为的是向旧世界冲击;曾几何时,那些飘飘荡荡的大字报却对着我冲击了!冲吧,我问心无愧!”

丁大头沉默了,直抽烟,他的心情大概也是很不平静的。

“说话呀,你的知识比我广博,这些年又在新华书店工作,整天埋在书堆里,你可以随便抽出一本书来敲敲我的头,最好是那些布面烫金的,敲起来有力!”

丁大头笑了:“那不行,敲破了头是很难收拾的,我只是想告诉你一个奇怪的生理现象,那资产阶级的味觉和无产阶级的味觉竟然毫无区别!资本家说清炒虾仁比白菜炒肉丝好吃,无产阶级尝了一口之后也跟着点头。他们有了钱以后,也想吃清炒虾仁了,可你却硬要把白菜炒肉丝塞在人家的嘴里,没有请你吃榔头总算是客气的!”

我跳起来了:“你你,……你也不能天天吃清炒虾仁呀!”

“谁天天到饭店里吃炒虾仁的,他有那么多的工资吗?”

“可也不少呀,同志,你不能低估这种潮流!”

“是你把大众低估了,大众是个无穷大,一百个人中如果有一个来炒虾仁,就会挤破你那饭店的大门!你老是叨念着要解放劳苦大众,可又觉得这解放出来的大众不如你的心意。人家偶尔向你索一盆炒虾仁,不白吃,还乐意让你赚点,可你却像沙子丢在眼睛里。”

“不不,我对大众没意见。”

“我知道,你是对那个朱什么冶有意见,他闭门不出了,你到哪里去揪他呢!”

“也不是全躲在家里。”

“当然,肯定会有许多人跟着劳动大众去吃虾仁。告诉你吧,即使将来地主和资本家都不存在了,你那吃客之中还会有流氓与小偷,还有杀人在逃的,信不信由你。”

我信了。我早就发觉过这一点,住旅馆需要工作证和介绍信,吃饭只要有钱便可以。我只好叹了口气:“唉,你的话也不无道理,可我总觉得勤俭朴素是我们民族的美德,何必在吃的方面那么顶真呢?”

“说得对,这对你个人来说是一种美德,希望你能保持下去。可你是个饭店的经理,不能把个人的好恶带到工作里。苏州的吃太有名了,是千百年来劳动人民创造出来的文化,如果把这种文化毁在你手里,你是要对历史负责的!”

我一听便凉了。我在学校里读过历史,知道那玩意可不是好惹的,万一被它钉住了,死都逃不脱的!可我也怀疑,这吃的艺术怎么会是劳动人民创造的呢,说得好听罢了,这发明权分明是属于朱自治和孔碧霞他们的。

也怪我的妈妈太热情,这天的晚饭竟然是五菜一汤,汤是用活鲫鱼烧的,味道鲜美。

丁大头眉开眼笑了:“你看,这社会风气已经渗透到你的家庭中来了,注意!”

七、南瓜之类

丁大头走后,我仔细地检查了我的行为。一个老朋友来了,为什么立即想到要去买菜呢?很简单,这是一种乐趣,也含有尊重与慰劳的意味。过去为什么不是这样的呢?记得渡江后和他在无锡分手时,我也曾为他送行,花了五分钱在摊头上吃了一碗小馄饨,他十分满意,我也情意绵绵。今天为什么不能那样做,一顿花掉五块多钱!也很简单,那时的五分钱是我全部流动资金的十分之一,而我今天的工资是七十五,加上我爱人的工资,再扣去家庭的开支,那五块钱也就等于五分钱。物质和精神的砝码一样大,情谊的天平是平平的。如果我今天还请丁大头吃小馄饨,即使他不介意,我又有什么必要让他忆苦思甜!如果让妈妈和爱人知道的话,肯定要把我一顿臭骂:“这些年你一直惦记个丁大头,来了以后只肯花五分钱,你还像不像个人呢!”

我当然像个人,而且自以为像个很好的人,不随波逐流,不见异思迁……可我有没有感到时间在流去,生活在变迁?我只知道忘记了过去就等于背叛,却不知道忘记了变化也和背叛是差不多的,同样是违反了人民的心意。不去管什么朱自治了,让他在小庭院里快活几天!

正当我想转弯的时候,反右斗争开始了。这个运动没有碰到我,差点儿还成了英雄哩。谁都承认我立场坚定,方向对头,早就以实际行动打击了资产阶级的“今不如昔”。只是由于我的心中有鬼,说话吞吞吐吐,行动也不积极,白白错过了一个提拔的机会,是个扶不起的刘阿斗。

我想转弯也来不及了,因为跟着便是大跃进,大跃进之后便是困难年。大跃进的时候人人都顾不上吃饭,困难年人人都想吃饭了,却又没有什么东西可吃的;酱油都要计划供应了,谁还会对大众菜有意见?连菜汤都是一抢而空,尽管那菜汤是少放油,多放盐。凡是能吃的东西人们都能下肚,还管它什么滋味不滋味!

这就苦了朱自治啦!他吃了四十多年的饭,从来就不是为了填饱肚皮,而是为了“吃点味道”。这味道可是由食物的精华聚集而成的。吃菜要吃心,吃鱼要吃尾,吃蛋不吃黄,吃肉不吃肥,还少不了蘑菇与火腿。当这一切都消失了的时候,任凭那孔碧霞有天大的本领也难以为炊。

人也真是个奇怪的动物,有的吃的时候味觉特别灵敏,咸、淡、香、甜、嫩、老点点都能区别。没得吃的时候那饿觉便上升到第一位,饿急了能有三大碗米饭(不需要上白米)向肚子里一填,那愉快和满足的感觉也是难以形容的。朱自治尽管吃了一世的味道,却也难逃此种规律。他被饥饿从小庭院中逼出来了,又拎着个草包成天在街上兜。这一次不是寻找美味了,只要看见那里围着人,便拼命地向里钻,企图能买到一点红薯、萝卜或花生米之类,不管什么价钱。无奈,他经常总是提着个空包回来,神情沮丧,疲惫不堪地走过我家的门前。我第一次见到他财大并不气粗,他也许是第一次感到金钱并不是万能的。照理说那朱自治也饿不了,城市不比农村,他有定量供应。大跃进之前他家的定量吃不了,经常向外调剂,现在虽说捐献掉两斤,那也不至于饿肚皮。奇

怪,一旦缺少了副食品和油之后,那粮食就好像是棉花做的,一天八两一顿下肚,还不知道是塞在哪个角落里!何况那思想也有问题,一顿不饱十顿饥,眼睛一睁便想吃东西。朱自治以前是眼睛一睁便想吃头汤面,现在却老是睁着眼睛看住桌上的饭碗,总觉得他碗里的饭要比孔碧霞女儿少了点。孔碧霞也没好气:

“是你的肚子里有鬼!”

“我有鬼还是你有鬼?一个是空的,一个是实的!”

孔碧霞一把夺过女儿的饭碗:“给你,都给你,反正女儿也不是你养的!”

孩子哇地一声哭起来了,夫妻俩吵得不可开交。吵到后来实行分食制,一只煤炉两只锅,各烧各的。在吃上凑合起来的人,终于因吃而分成两边。再也看不见他们两个套着膀子走路了,再也听不见孔碧霞嗲声嗲气地叫喊:“老朱喂,你来噻!”

资产阶级的家庭关系本来就是建筑在金钱上的,当金钱处于半失效的状态时,那关系也就会处于半破裂。我倒有点为朱自治庆幸了,这下子他可以不再迷信金钱,也可以知道一粥一饭的来之不易,不要那么无休止地去寻求美味。

我这样想并不是幸灾乐祸,因为我和朱自治同处于一个灾祸之中,他饿我也饿,同样地饿得难受。按说,我是一个饭店的经理,在吃的方面还是有点儿办法的,在这种特定的时刻,权力的作用会明显地超过金钱。可我一贯自认为是个很好的人,饿死事小,失节事大,不去搞那些鬼把戏。老实说,也没有饿到真的爬不起来的地步。况且我的家庭很巩固,妈妈和我的爱人拼命地保证重点。妈妈总是让我先吃:“快吃吧,吃了上班去,我反正没事,等一歇。”我知道这“等一歇”是什么意思,总是偷偷地把饭拨掉点。我的爱人重点保证女儿,孩子读小学,正在长身体,放学回家等不及放书包,便喊肚子饿,不管给她多少,她都会呼呼啦啦地吃下去,哪像现在的孩子,吃饭都要大人逼!

我爱人的身体本来就不好,不久便发现腿也肿了,脸也泡了。这是当时的一种流行病,谁都会医,药方也很简单:一只蹄髈、一只鸡,加四

两冰糖煎服便可以,到哪里去找呢!

我有点心事重重了,走路也闷着头。走过阿二家门前时,他在门内向我招手。

阿二早已不挖河道了。当年以工代赈时,每天只拿三斤米,他积极工作,毫无怨言,不愧为工人阶级。领导上十分器重他,安排他到搬运站去工作,现在是基层工会的主席。他对我很信任,总以为我说的话都是对的。可不,那黄包车已经进了博物馆,三轮车也不多见,他虽然没有当上司机,却也是司机的领导哩。

我进了阿二家的门,见阿二的爸爸也坐在天井里。这老头儿有好几年对我不予理睬,后来儿子当了干部,定了工资,讨了媳妇,阿三、阿四也都就了业。老头儿也不卖葱姜了,在那摆摊头的地方摆张小桌子,天天晚上弄点老酒抿抿,看见我总是笑嘻嘻地打招呼:“来来,弄一杯!”如今的日子又不大好过了,小桌子又搬到了天井里。我喊他一声老伯伯,他想笑却没有张开嘴。

阿二把我拉到一边:“怎么样,我看见阿嫂的脸色有点不对!”

“是啊,有点浮肿。”

“这样吧,我们有两辆汽车到浙江去拉毛竹,毛竹没有拉到,却在哪个山沟里弄来两车南瓜。你准备一辆小板车,天不亮便到码头上,我弄一车给你。”

“不不,我又不是你们单位里的人,怎么好分你们的东西,再说……”

“别说啦,我决不会做那种‘狗皮捣灶’的事情,那南瓜有我一份,你先拉去吃。我们经常有车子在外面跑,总比你活络点。”

“那……”

“那什么呀,去拉吧!”老头儿在旁边插话了:“南瓜有什么稀奇,大农场,拖拉机,我还等着喝你的伏特加哩!”老头儿咧开嘴笑了,他是在挖苦我的。

我也笑了:“老伯伯,你别挖苦我,我还没有翻你的老底呢。那时候阿二去挖河泥,你看见我连头也不点。后来怎么样啦,天天喊我弄一

杯。别着急,目前是暂时的困难,好日子会回来的!”

老头儿真心地笑了,连连点头:“对对,我相信,相信。”

千千万万个像阿二爸爸这样的人,所以在困难中没有对新中国失去信心,就是因为他们经历过旧社会,经历过五十年代那些康乐的年头。他们知道退是绝路,而进总是有希望的。他们所以能在当时和以后的艰难困苦中忍耐着,等待着,就是相信那样的日子会回头,尽管等待的时间太长了一点。我很后悔,如果当年能为他们多炒几盘虾仁,加深他们对于美好的记忆,那,信心可能会更足点!

我回家把这件事情告诉了妈妈,妈妈谢天谢地,连忙四处奔走,去借小板车。

小板车借回来了,可那朱自治却像幽灵似的跟着小板车到了我的家里!他的样子很拘谨,也很可怜。叫他坐也不坐,痴痴呆呆地站在门角落里。我暗自稀奇,现在来找我干什么,难道还对大众菜有意见!

妈妈对朱自治一直很尊敬,硬拉朱自治坐下,还替他倒了杯水:

“朱先生,有什么话你就说吧,是不是又和孔碧霞吵架啦!”

“哪有力气吵啊,你们看,瘦的!”朱自治叹了口气,拍拍他那曾经两度凸出来的肚子,他那肚子是生活的晴雨表。

是呀,朱自治那个颇有气派的肚子又瘪下去了,红油油的大脸盘也缩起来了,胖子瘦了特别惹眼,人变得像个没有装满的口袋,松松拉拉地全是皮。我说:“忍耐一下吧朱先生,这对你也是一种磨炼!”

“啊……也对,也对。”朱自治迟疑着,想站起来,又坐下去。

妈妈是个饱经沧桑的人,她从朱自治的神态上就已经看出,这是一种有求于人而又难以启口的表现。她在解放前被逼得无路可走时,也曾向朱自治借过钱。她曾经对我说过,向人借钱的日子最不好过。失魂落魄地跑进门,开不出口来又跑出去,低声下气地不知道要兜几个圈子。她大概是不想让自己受过的罪再让别人受,便替朱自治壮胆:

“朱先生,有什么话就说吧,说出来也好让我们帮助。人生一世,谁还没有个为难之处!”

“南瓜。”朱自治没头没脑地开了口:“听说你家去拉南瓜,能不能

分点给我，我……给钱。”

妈妈虽然知道朱自治绝不是来借钱的，却没料到他是来讨南瓜，这事儿她不好做主，因为南瓜和我爱人的浮肿病有点关系，万一有个三长两短，那就说不过去。不答应朱自治吧，她也觉得说不过去，因为她知道许多公子落难，义仆救主的故事，只好抬起头来看看我：“小庭，你看呐！”

用不着看了，朱自治那可怜巴巴的样子就在眼前。从他趾高气扬地高踞在阿二的黄包车上，大摇大摆地出入茶馆酒肆，直到今天抖抖索索地向人家讨几只南瓜，天意的惩罚也是够受的啦！

我点了点头：“好，分点给你。”

朱自治双手一合：“谢谢，谢谢，我给钱！”说着便把手伸进口袋，他并没有忘记钱的魔力。

我突然产生了反感：“不要钱，你要答应我一个条件！”

“什么条件？”朱自治又惶了。

“跟我一起去拉板车。不劳动者不得食，总不能再叫人把南瓜送到你家里！”

“当然当然，我一定劳动！可……可我不会拉板车，弄不好会把车子拉到河里。”

我一想，这倒也是个实际问题：“你总会推吧，我在前面拉，你在后面推。”

“会，我一定用力推。”

“那好，明天早晨四点钟，你在巷头上烟纸店的门口等我，过时不候！”我给他把时间定死了，劳动者总要守点儿劳动纪律。

第二天早晨三点五十五分，我把小板车拉出了大门，在空寂的小巷里唧唧唧唧地向前滚。

果然不错，朱自治站在那里哩。我本来的意思是叫他站在烟纸店的屋檐下，那里可以避一避深秋黎明时的寒露。可他却紧紧地裹着一件旧雨衣，像个电线木杆似的站在路灯的下面，为的是能让我一眼便看见。我看了很高兴，劳动是能改造人的，起码叫他懂得了准时准点。

“早啊,朱先生,叫你久等了吧。”

“可不是,我已经抽掉了五根香烟!”朱自治说着便脱雨衣,弯下身来帮我推。

我连忙说:“穿上,空车是用不着推的。”我存心要教会朱自治一点儿劳动的本领,便把车杠向上一提:“你看,只要前高后低,重心在后,它自己会向前滚的,费不了多少力。等会儿装了南瓜,也只要你在上坡下桥时帮我一把。到了平地,你只要一手搭住车帮,弯腰向前,把体重压到车帮上,跟着跑跑便可以。”

朱自治嘘了口气,原来这推车也不费力!他把雨衣向手弯里一搭,甩打甩打地走在我的身边。朱自治东张西望,兴致勃勃,好像是第一次看到这黎明前的苏州,第一次看到清洁工人在路灯下扫地,第一次听到那粪车在巷子里辘辘地滚过去。

“高经理,现在几点啦,我怎么觉得还是在半夜里。”

“四点零三分。怎么,你没有表吗?”我有点奇怪了,朱自治的时间怎么是用抽几支香烟来计算的?

“不瞒你说,读大学的那一年家里给了我一只浪琴金表,我戴了三天就不想要了,总觉得手腕上多了个东西,很不舒服。”

我差点儿笑出来了,那只浪琴金表大概早已下肚,放在肚子里是最舒服不过的。

“那你不要准时上课吗,迟到了也是很不舒服的。”

“迟到,嘿嘿,我根本就不到。野鸡大学,文凭也可以卖的。唉,书到用时方恨少呀,现在想看点儿书了,还有许多字不识呢!”

我对朱自治刮目相看了,不会拉板车也罢,能看点儿书总是好的,开卷有益。

“都看点儿什么书呢?”

“喏,当然是关于吃的,食谱。这些时没有什么吃的了,晚上睡不着,想起自己一生吃过的好东西,好像那些大盘小碗,花花绿绿的菜肴就在眼前。不瞒你说,我在这方面的记忆力特别好,我能记得几十年前吃过的名菜,在什么地方吃的,是哪个厨师烧的,进口是什么味道,余味

又是怎么样的……你别笑,吃东西是要讲究余味的,青橄榄有什么吃头?不甜不咸,不酥不脆,就是因为吃了之后嘴里有一股清香,取其余味。人真是万物之灵啊,居然能做出那么多好吃的东西!从天上吃到地下,从河里吃到海里。人要不是会钻天打洞地去吃的话,就不会存在到今天!恐龙只会吃草,那么巨大的东西如今又在哪里?……你别叹气。是的,我也觉得很可惜,当年吃过了也就算了,没有写日记,现在回想起来就不那么全面,所以想看食谱,复习复习,还可以熬馋呢!……哎哎,你慢点走啊,听我说,那些食谱看了叫人生气,记载得很不详细,我认为最好吃的里面都没有,特别叫人生气的是看不起我们苏州的菜,都是些奇里古怪的东西,什么皇帝吃过的。皇帝有什么了不起,每天一百只菜,摆摆场面,还不知道有几只是可以吃的!乾隆皇帝为什么要三下江南呀,就是到苏州来吃的……”

实在熬不住了:“快走吧,拉南瓜去!”我把南瓜二字说得特别响,目的是让他的头脑清醒点。

“对对,我们绝不能忽视南瓜,用南瓜照样可以做出上等的美味。你们的店里过去有一只名菜,名叫西瓜盅,又名西瓜鸡。那是选用四斤左右的西瓜一只,切盖,雕去内瓢,留肉约半寸许,皮外饰以花纹,备用。再以嫩鸡一只,在气锅中蒸透,放进西瓜中,合盖,再入蒸笼回蒸片刻,即可取食。食时以鲜荷叶一张衬于瓜底,碧绿清凉,增加兴味。”朱自治背完了食谱,又摇摇头:“其实那西瓜盅也是假的,鸡里并没有多少瓜味。瓜甜鸡咸,二者不配,取其清凉之色而已。我们可以创造出一只南瓜盅,把上等的八宝饭放在南瓜里回蒸,那南瓜清香糯甜,和八宝饭浑然一体,何况那南瓜比西瓜更有田园风味!……”

够了。这一大篇吃经念下来,已经快到码头了。我也不想打断他的话,也不再希望他有什么转变,这人是本性难移!让你去画饼充饥吧,我可要改变主意。我本来想把南瓜分给他一半,现在重新决定:分给他三分之一!

八、殊途同归

万万没有想到,一个好吃的人和一个反好吃的人居然站到一起来了!文化大革命中我成了走资派,朱自治成了吸血鬼,两个人挂着牌子,一起站在居民委员会的门口请罪。

朱自治成为吸血鬼犹可说也,我成了走资派……也有道理。因为在困难年过去之后,我觉得时机已到,可以对过去的改革加以检讨,再也不能硬把白菜炒肉丝塞到人家的嘴里了。何况当时的形势和人们的要求也逼着我的转变。领导上提出要开高级馆子、卖高价菜,借以回笼货币,我们本来就是名菜馆,更是义不容辞的。人们在困难年中饿坏了,连我这个素以不饕而自居的人,也想吃点好东西。妈妈也到自由市场上去游转,五块钱一斤豆油,十块钱一只鸡,看了摇头惊呼,还是笑嘻嘻地拎一只回来,加水煎熬,放在我爱人的面前:“吃吧,孩子,这两年苦坏了你!”老人说这话的时候眼泪都掉下来了,其实我爱人的浮肿病早已消退。只有小女儿兴高采烈,到处宣扬:“我们家今天吃了一只鸡!”好像发生了什么惊天动地的事情!

高价菜又把朱自治吸引到我们的店里来了,而且是和孔碧霞一起来的。两个人虽然没有套着膀子,却是合拎着一只大草包,一个抓住一个拎襟,相视而笑,十分亲热。那包里装满了高级糖,高级饼,两人刚刚剃过高价头,容光焕发,喜气洋溢,一股子高级香水味。金钱又发生作用了,那垂老的爱情当然是可以弥合的。

二十元一盆的冰糖蹄膀,朱自治一下子便买了两只,分装在两个饭盒子里。我和朱自治自从拉了那趟南瓜之后,见了面都要点头,说两句天气,以纪念那一段共同的经历。困难终于过去了,店里有了东西卖,我也觉得增添了几分光彩。看见朱自治来买蹄膀便和他搭话:“好呀,老顾客又回来啦!”

朱自治也高兴,笑着,拉拉我的手,可那话却是不好听的:“没有办法呀,蹄膀和冰糖自由市场上没有,只好到你们店里来买老虎肉!”

“噢……那你为什么不趁热吃,带回去给孩子?”

“不不,你们的蹄髈没烧透,不入味。我们带回家去再烧一下,再用半斤鸡毛菜垫底,鲜红碧绿,装在雪白的瓷盘里,那才具备了色香味。你们的菜呀,还差得远呢!”

我听了有点懊丧,当时不该把南瓜分给他三分之一。可我也接受了教训,绝不把这股气扩散到别人的头上去。六三、六四年的供应情况又和大跃进之前差不多了,我要致力于炒虾仁,使人对这美好的日子留下更深刻的记忆,人总不能老是后悔。可这恢复工作比我当初的改革要困难百倍,从精细到粗放,从严格到马虎,从紧张到懒散,从谦逊到无理都是比较容易的,要它逆转可得费点劲儿哩!

包坤年早就不当“店小二”了,这是在我的启发下改变的。他的行政职务虽然还是服务员(对此他很有意见),服务的时候却像个会议的主持人,高坐在那会场似的店堂里。吃客拥进店堂时他便高声大喊:“喂喂,不要乱坐,先把前面的桌子坐满!听见没有,你为什么一个人溜到窗子口?”

“同志,请你来一下。”

“要点菜吗?看黑板,都写着咧。”

“同志,我想要两只苏州名菜。”

“名菜?每一只菜都有名字,写得清清楚楚的。”

几乎每天都有吃客吵到我的面前:“我们是来吃饭的,不是来受气的!”我忙着给人家赔不是,同时抓紧时间开会,做思想工作,订服务公约,批评别人,检查自己。还得感谢我们苏州的滑稽艺术家张幻尔——祝他安息。他那时编演了一个滑稽戏,名叫《满意不满意》。这戏还真帮了我不少忙,我还请他到店里来做了一次报告,他的报告比我的报告有效,所以便招待了他一顿,没有收钱,是在宣传费用中报销的。

以上种种,到了文化大革命中自然就成了罪孽,说我是全面复辟了资本主义,伤天害理地强迫革命群众去服侍城市里的老爷!张幻尔的那一顿饭也不是好吃的,陪着我狠狠地被斗了一整天!

包坤年成了头头了,对准着我造反。他那时有一种错觉:认为打倒

了局长便可以当局长,打倒了经理便可以当经理。局长已经被人家抢先打倒了,他也只好屈就点。他确实也具备了各种对我造反的条件:历史清白,一贯拥护革命路线,最最难得的是在一九六三年便抵制过我的复辟行为,遭到过我的残酷打击!这话也并非完全捏造,一九六三年我是批评过他,他那名菜都有名字的妙语,还被报纸上的一篇文章引用过,虽然没有点名,总会有点压力。所以他在控诉我的罪行时总是义愤填膺,热泪盈眶:“那时候乌云压城城欲摧,我势单力薄,孤军奋斗,只好暂时屈服在他的淫威下面,我盼啊,盼啊……”包坤年经常在店堂里看小说,词儿是不少的,也不空洞,他对我的情况十分熟悉,重磅炸弹都捏在他手里。那时候他老是跟着我转,我也把他当作左右手,可算是无话不谈的。诸如我小时候曾经帮朱自治买过小吃,住了他家的房子不给钱等等。有些话是为了说明旧社会的不平,有些话纯属闲聊,并无目的。包坤年把这些事儿都串起来了,批道:

“这个死不悔改的走资派,从小便被资本家收买,眼看蒋家王朝的末日已到,便带着不可告人的目的混入我解放区。解放初期伪装积极向上爬,攫取了权力;一有机会便全面复辟资本主义,为他的主子效力!”这些话虽然不合事实,却也很有逻辑性。我是在蒋家王朝末日已到时到解放区去的,解放初期我是很努力,当了经理当然有了权力,一有机会是改变过经营管理!任何事情只要先把它性质肯定下来,怎么说都有理,而且是不需要什么学问的。“白马非马”,如果我首先肯定了你是只马,那就不管你是白的还是黑的,你怎么玄也休想滑得过去!要不然的话,世界上的黑白为什么会那样容易就被颠倒了呢?

也有人是出于一种好奇心理:“是呀,哪有房屋资本家是不收房钱的?不是一天两天啊,一住几十年,这里面到底是什么关系?”这些人并无恶意,只是想知道人与人之间的秘密关系。

包坤年可要抓住这些关系做文章了,立刻通过居民委员会去外调。

这个朱自治呀,没说头。他除掉好吃之外还有个致命的弱点——怕打。当包坤年把袖管一捋,桌子一拍,他就语无伦次,浑身发抖。

“说,你有没有收买过高小庭?”

“收……收买过的。”

“怎么收买的?”

“经常给他钱。”

“在什么地方给的?”

“在酒店里。”

“总共给了多少?”

“大……大约有几十万。”

“啊!这么多的钱你是怎样从银行里取出来的?”

“用,用不着取,是零钱,对对,是伪币。”

幸亏包坤年要比我的老祖母明白得多,如果他也只知道铜板和银元的话,很可能要闹笑话。

“伪币?……伪币也是钱!快说,解放以后你们是怎么勾结的?”

“没有。解放以后他对我不大客气。”

“胡说,把他带走!”

“啊啊,我该死,我忘了,困难年他还给了我一车南瓜哩!”该死的朱自治呀,他忘了说三分之一,为了这个数字,还害得我多挨了几拳头!

这下子不得了啦,证据确凿,罪行累累!更不得了的还在后面呢,三转两绕把个孔碧霞也牵出来了。她的前夫解放前夕逃往香港,困难年还从香港给她寄过罐头,秘密指令就藏在罐头里!她是潜伏特务,我和特务内外勾结,窃取国家机密……包坤年看的都是反特小说,看多了自己也会编。你看:天亮前的三点五十五分,朱自治穿着一件美制的雨衣(那件破雨衣确实是美国货),歪戴着一顶鸭舌帽(没有戴),站在电灯柱下徘徊,连续不断地抽了五支香烟。准四点,高小庭拉着板车从巷子里出来,左右这么一看,轻轻地说了一声:“走……”故事的开头很有吸引力,因而十分畅销,到处请他去作批判发言。他没完没了地讲着,我弯成45°角站在那里,还要不时地回答问题:

“你有没有罪?”

“有罪,我有罪!”我确实承认自己有罪。当年包坤年听说杨中宝到孔碧霞家吃饭,便编造出杨中宝开地下饭店,而且还有个妖里妖气的

女人收钱。我不但没有批评他,却从自己的需要出发,对他重用,加以鼓励。如果编造谎言能得到好处的话,那他为什么不编呢?好处越大,他就会编得更加离奇!

“回答,你是不是罪该万死!”

我拒不回答。我不想死,我要活。我有错误要纠正,还有那愿意为之牺牲的共产主义事业……

拳头又落到我的身上来了,打得并不重,却像刀尖刺在心头,我总觉得包坤年握着的刀柄,有一半儿是我做成的!

居民委员会也不能没有表示,可那批斗的事儿都给包坤年包了,他们捞不到,只好勒令我和朱自治、孔碧霞早晨到居委会的门口请罪。我和朱自治终于站到了一起!

挂着牌子站在居委会的门口请罪,那滋味比“押上台来!”更难受。押上台去向下一看,黑压压的一大片,也不知道有几个人是我认识的。站在居委会的门口就不同了,巷子里早晨进出的都是熟人。那拎着菜篮的老太是看着我长大的,那阿嫂结婚的时候曾经请我坐过席,那孩子嘛……前几天见了我还喊叔叔哩!我低着头不敢看人,人们也不忍看我。好端端的一个人,又不偷又不抢,怎么突然之间像个吊死鬼似的,一动不动地竖在那里!有人绕道走了,绕不掉的人便匆匆地奔过去,装着没看见。偏偏我又能从他们的脚步和鞋袜上看得出是谁。看得最准确的当然是我的妈妈了,她小时候缠过足,后来才放开,那双半大的脚围着儿子转过多少回啊,如今是那么沉重而零乱,歪斜而迟疑。

只有阿二满不在乎,他走到我身边便高声咳嗽,轻轻地说:“别着急,先熬着点。”

孔碧霞可熬不住呀,她是个爱打扮而又讲风度的人,如今剃了个阴阳头,挂着个女特务的牌子站在那里。特务而加女字,更容易引起人们的注目和非议,因为谁都不会想到女特务会做菜,总是想到女特务会搞一些乱七八糟的男女关系。再加上那个该死的朱自治,居然交待他曾经看到孔碧霞从外国罐头上剥下商标纸,一直压在玻璃台板里,破四旧的时候才烧毁。使得包坤年的故事里又多了一个情节。那密码就在商

标纸的背后！孔碧霞又羞、又恨、又急，站了不到半个小时便砰然一声倒地，满脸鲜血，人事不省。亏得居委会主任并不存心要和谁作对，便叫人把她搀了回去。

我对朱自治更加反感了，请罪的时候都离他远点，表示我和他并非同类。你朱自治好吃倒也罢了，在那样的情况下，好吃根本就算不了一回事体。可你为什么那么怕打，为了一时的苟安，竟然不顾夫妻情义，提供那种不负责任的细节。由此我也得出结论，好吃成性的人都是懦弱的，他会采取一切手段，不顾任何是非，拼命地去保护、满足那只小得十分可怜而又十分难看的胃！

第二天一早，阿二带着二十多个搬运工人来了，一个个身强力壮，头上戴着柳条帽。队伍由一部大榻车开路，榻车上装着杠棒、绳索和铁钎。车子到了我们的面前时便往下一停，有人大喝一声：“是谁叫你们站在这里的？”

朱自治又吓了，慌忙回答：“是居委会主任。”

阿二把手一挥：“去几个人，把主任找来。”

五、六个人同时拥进大门，把主任拉到了大门口。

“是你叫他们站在这里的？”

“是的，请问你们是哪一派的？”居委会主任感到有些来者不善。

“我们是杠棒派，告诉你，这里不许站人，妨碍交通！”说着便有人到榻车上抽杠棒，拿铁钎。

居委会主任连忙摆手：“革命的同志们，这件事情可以商议，可以商议。”

阿二说：“这样吧，如果你觉得不好交待的话，那就叫他们到拐弯的弄堂里去扫地。”

居委会主任是个很有社会经验的人，他立刻明白了阿二的用意，也没有必要冒挨打的风险，便对我们挥挥手：“回去，各人回家去拿扫帚。”

阿二高兴地瞟了我一眼：“不许偷懒，扫得干净点！”

我听了暗自发笑，那拐弯的弄堂是条死弄堂，总共不到三十米，划

不了几扫帚。

可是我却无法和朱自治分开,我扛着扫帚进弄堂,他也紧紧地钉在我后面,我扫他也扫,我歇他也歇,还要找机会向我表示谢意:“还是你的朋友好,够交情!”

我忍不住叫出来了:“我的朋友是不讲吃喝的!”

九、士别三日

其实并不是别了三日,三三得九,整整九年我没有见到过朱自治。他大概还住在五十四号里,我与全家下放到农村去了九年。

九年的时间不算太短了,所见所闻再加上亲身的经历,足够我进一步思考吃饭的问题。在思考中度过了五十大寿。

过生日的那一天,妈妈杀了一只老母鸡,开后门弄来一斤洋河大曲,闷闷地喝了几杯。三杯下肚之后突然惶恐起来,怎么搞的,什么事儿还没有干呐,却已经到了五十岁!解放初期我和五十多岁的老先生一起开会,上下台阶都得看着他点。在我的印象中,年过半百已经是老人了;在农民的生活中,五十岁的人如果有儿有女而且儿女都很孝顺的话,他是不挑重担的。“一事无成两鬓斑,常使英雄泪满衫!”我虽然不是英雄,却也流下了几滴眼泪。我在泪眼与醉意中胡思乱想:如果能让我重新工作的话,我第一要……第二要……简直像在做梦似的。梦也是一种预感吧,它有时候也能实现,只是实现起来不如梦中那么容易。

灾难过去之后,我又回到了苏州。这一次可不是背着背包回来了,一家大小,瓶瓶罐罐,台凳桌椅,农具家什装满了一卡车。我对苏州城有点不习惯了,觉得它既陌生又熟悉。大街小巷都没有变,可是哪来的这么多人哩!苏州人没有事儿并不是游园林,而是荡马路。如今,你连过马路都得当心点!在大街上碰到多年不见的熟人时,只能站在人行道的边上讲话,讲话要提高嗓门,还不停地有人从你的肩膀上擦来擦去。大批下放并没有能减少城市的人口,却把个原来比较安静的城市涨得满满地。涨得我连个安身之处也没有了,只好借住在亲戚的家里。

也好,这下子可以和那朱自治离得远点,他在城东,我在城西。

组织部的同志找我去谈话,那位同志也和我差不多的年纪。当年要饿我三天的老部长早已不在了,祝他安息,在“文化大革命”中,他在另外一个城市里“自动跳楼”。什么都懂的丁大头也不在了,他就死在“什么都懂”的上面,而我这个什么都似懂非懂的人却活到了今天……

“组织上考虑,你还是回到原来的工作岗位,有什么意见?”

我什么意见也没有,只是感到一阵心酸,忍不住自己的眼泪。如果坐在我面前的还是老部长的话,我会和他抱头痛哭的!老部长啊,你再也用不着饿我三天了,我已经深深地懂得了吃饭的意义;放心吧,丁大头,我再也不会硬把白菜炒肉丝塞到人家的嘴里。我要拼命地干,我要把时间放大三倍,一份为了老部长,一份为了你……

“不要激动,过去的都过去了,困难还在前面。”

我点点头。这是用不着说的,每次灾难都是首先影响到吃饭;灾难过去之后第一个浪头便是向食品市场冲击,然后才想到打扮,想到电风扇和电视机。

我的估计没有错,但是还有两点没有估计在内。十年动乱以后乱是停止了,可那动却是大面积的!人们到处走动,纷纷接上关系。访战友,看亲戚,老同学,老上级,有的被关押了十年,有的从反右以后便失去了联系。人们相互打听,谁谁有没有死,谁谁又在哪里。“好呀,看看去!”几乎是每一个家庭都会发生一次惊呼:“啊呀,你怎么来啦……”我虽然反对好吃,可是在这种情况之下并不反对请客。我也是人,也是有感情的,如果丁大头还能来看我的话,我得好好地请他吃三天!

还有一点没有估计在内,那就是旅游的兴起。旅游这个词儿以前我们不大用,一般地都叫作“游山玩水”,含有贬义。现在有新意了,是领略祖国的山河之美。不管是什么意思,我都不反对,人是动物,应该到处走走。特别是欢迎外国朋友们来走走,请他们看看我们民族的文化,顺便赚点儿外汇。别以为苏州的园林都是假山假水,人工造的,试问:世界上哪有一种文化不是人为的?真山真水虽然伟大,但那算不了

文化,是上帝给的。何况苏州的园林假得比真的还典型、集中、完美,全世界独一无二,不是吹的!

苏州的饭菜呢? 经理。在这个古老的天堂里吃和玩本来是并驾齐驱的,你既然不反对请客,不反对旅游,还欢迎外国朋友,那就不能落后,落后了是要挨打的。

可不是,开始的那阵子人们意见纷纷,什么吃饭难呀,品种少呀,态度坏呀。有人提意见,有人发牢骚,有人指着我的鼻子骂山门。那包坤年还和一帮青年人打了起来,真的挨了几拳头! 没有办法,包坤年也需要有个恢复的过程。“文化大革命”期间他不是服务员,而是司令员,到时候哨子一吹,满堂的吃客起立,跟着他读语录,做首先……,然后宣布吃饭纪律:一号窗口拿菜,二号窗口拿饭,三号窗口拿汤;吃完了自己洗碗,大水槽就造在店堂里,他把我当初的改革发展到登峰造极!

别人对我发牢骚,我也对别人发牢骚,我的牢骚只能私下里发:“现在的事啊,难哪……”不能在店堂里发,如果伙着大家一起发的话,那不是要把店堂吵炸啦! 我得注意点,年岁也不小了,不能那么毛毛糙糙。特别是对包坤年,得讲个团结,他整天都在等着我打击报复呢! 不错,他在“文化大革命”中打过人,但也只是打过我,没有打过别人。朱自治招得快,没有挨过打,孔碧霞也不是他打的。他自己也是上当受骗,又没有能当上经理,牢骚要比我多几倍!

包坤年挨了人家几拳之后,便到办公室里来找我,面部的表情是很尴尬的:“高经理,我……过去,对不起你……”

我连忙摇手:“算了算了,过去的事情别提,那也不能完全怪你。如你是来检讨的话,那就到此为止;如果你有什么事儿的话,那就直说,不必顾虑。”

包坤年翻翻眼睛,半信半疑:“我想……我这个人不宜于当服务员,说话的嗓门儿都是两样的,容易惹人家生气。过去的那些年胡思乱想,都是不切实际。今后再也不能靠吵吵喊喊了,要凭本事吃饭,技术第一。所以我想好好地学点儿技术。”

“你想离开饭店?”

“不,那也是不现实的。我想去当厨师,学烧菜。不管怎么样,我学起来总比别人方便。”

“噢……”我的脑子悠转着,考虑两个问题:一是包坤年的服务态度恐怕一时难改,很难保证他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不和人家的打起来。二是厨房里确实也需要人,培养年轻的厨师已经成了大问题。我二话没说,马上同意。

包坤年十分满意,到处宣扬:“放心,这个走资派是不会打击报复的,我那么打他,他都没有记仇,你贴了张把大字报,发过几次言有什么关系!”

别小看了包坤年的宣扬,还真起了点稳定人心的作用。人心思治,谁也不想再翻来覆去。牢骚虽多,可那牢骚也是想把事情做好,不是想把事情弄坏,只不过性急了一点。性急也是一种动力,总比漫不经心好些。

我和同志们仔细地研究了吃客的意见,发现除掉有关服务态度之外,要求也很不统一。有的要吃饱,有的要吃好;有的要吃得快(赶着去玩儿),有的不能催(老朋友相聚);有的首先问名菜,有的首先问价钱;有人发火是等出来的,有人发牢骚是因为价钱太贵。不能把白菜炒肉丝硬塞在人家的嘴里,可那白菜炒肉丝也是不可少的,只是要炒得好些。

我的思想也解放了,不搞一刀切,还引进了一点洋玩意。不叫大众菜,叫“快餐”,一菜、一汤、一碗饭,吃了快去游园林,否则时间来不及。其实那快餐也和大众菜差不多,只是听起来还有点儿效率。否则的话,人家一看“大众”便上楼,谁都欢喜个高级。我们把楼下改成快餐部,一律是火车座,皮靠椅,坐在那里吃饭也好像是在旅行似的。青年人特别满意,带劲儿,又新鲜,又花不了他们几个钱。我年轻的时候只知道拖拉机,他们现在比我当年懂得多,还知道外国有种餐厅是会转的。怎么个转法我也不知道,反正在火车座儿里吃饭也有动的意味。当然,快餐的味道也不错,如果要添菜也可以,熏鱼、排骨、油爆虾、白斩鸡都是现成的。有个青年朋友吃得高兴起来还对着我打响指:“喂,最好来瓶

威士忌!”这一点我没有同意,我担心那威士忌和伏特加也是差不多的。

楼上设立炒菜部,把会场似的店堂再改过来,分隔成大小不同的房间,一律是八仙桌,仿红木的靠背椅,人多可加圆台面,墙角里还放几盆铁树什么的。老年人欢喜怀旧,进门一看便点头:“唔,还是和过去一样的!”其实和过去也不一样了,如果真和过去一样的话,他们也会有意见:“怎么搞的,二十多年了,还是这样破破烂烂的!”

当我忙得满身尘土,焦头烂额的时候,背后也有人说闲话:“都是这个老家伙,当年拆也是他,现在隔也是他,早干什么的!”我听了心往下沉,什么,我也成了老家伙啦!老……老得还可以嘛,那家伙二字是什么含义?也罢,干活儿不能动手抓,总得使几样家伙的。何况我从拆到造也不是简单的重复,内中有改进,有发展,这就叫不破不立。遗憾的是从破到立竟然花去了二十多年,我的心里也是不好受的。

改造店堂和引进一点洋玩意都好办,要恢复传统的名菜,全面地提高质量就难了,难在缺少人才。杨中宝和他的同辈人都纷纷退休了,有的是到了年龄,有的是想尽办法提早退休,好让子女顶替。名菜虽然都有名字,有些菜名青年人连听也没有听到过,他们的心里也很急,纷纷要求学习,而且对杨中宝十分想念。许多人虽然没有见过杨中宝,但都听师傅说起过,说杨中宝的手艺如何如何,肯定也会说我当年对杨中宝是怎样怎样的。历史不仅是写在书中,还有口碑世代流传!

我决定去求见杨中宝,希望他不记前嫌,来为我们讲课,按教授待遇,每课给八块钱。

我去的那天天下大雨,大雨也要去!

杨中宝见我冒雨而来,十分感动:“啊……你还没有忘记我!”他确实老了,行动蹒跚,耳朵也有点不便。当我说明来意并作了检讨之后,他紧紧地握住我的手,拍拍我的手背:“你呀,还说这些干什么呢,那些事我早就忘光了。我只记得那里是我的娘家,我在那里学徒,在那里长大。我发过几次狠了,临死之前一定要回娘家去看看兄弟姐妹。你请也要去,不请也要去,听说你们现在忙得不错哩!”

我听了很感动,这是一个老工人的胸怀,也是一个老工人的心意,他对我们的事业是有感情的,那感情比我深厚。

杨中宝来了,是由他的孙子陪同来的。他先把我们的店里里外外看了一遍,不停地点头叫好,说是和过去简直不能比。特别是那宽大的厨房,冰箱,排气风扇,炊事用具,雪白的灶头,他当年在交际处也没有这种条件。我把所有菜单都请他过目,他看得十分仔细。

杨中宝开讲的时候,全店上下都来了,把个小会场挤得满满的。我请他解放思想,放开来讲,多讲缺点。可是杨中宝讲得很有分寸,入情入理:

“我看了,你们工作得蛮好。要说苏州的名菜,你们差不多全有了,烧得也好。缺点是原料不足和卖得太多引起的。这事很难办,现在吃得起的人太多,十块八块全不在乎。据讲有些名菜你们连听也没有听说过,这也难怪,一种菜往往会有很多名字。比如说苏州的‘天下第一菜’,听起来很吓人,其实就是锅巴汤……”

下面轰地一声笑起来了。

“就是锅巴汤,你们的菜单上天天有。有些名菜你们应该知道,但是不能入菜单,大量供应有困难。比如说鲃肺汤,那是用鲃鱼的肺做的。鲃鱼很小,肺也只有蚕豆瓣那么大,到哪里去找大量的鲃鱼呢?其实那鲃肺也没有什么吃头,主要是靠高汤、辅料,还得多放点味精在里面。鲃肺汤所以出名,那是因为国民党的元老于右任到木渎的石家饭店吃了一顿,吃后写了一首诗,诗中有一句,叫‘多谢石家鲃肺汤。’从此石家饭店出了名,鲃肺汤也有了名气。有些名菜一半儿是靠怪,一半儿是靠吹。”

我向椅背上一靠,深深地透了口气。

“你们的缺点也不少,为什么把活鱼隔夜杀好放在冰箱里?为什么把青菜堆在太阳里?饭店里的东西除掉酒以外,其余的都得讲究新鲜。过去有一只菜叫活炒鸡丁,从杀鸡到上菜只有三分多钟,那盆子里的鸡丁好像还在动哩!”

包坤年举手发言了:“杨师傅,请你说说,这么快都有什么秘密?”

“也没有什么秘密,主要手脚快,事先做好一切准备,乘鸡血还未沥干时便向开水里一蘸,把鸡胸上的毛一抹,剌下两块鸡脯便下锅,其他什么也不管。这……这主要是供表演用的,也可以为厨师增加点名气。”

杨中宝为我们讲了两个多钟头,又到厨房里去实地操作表演;老人的兴致又高,不肯休息,回家后便犯老病,睡了十多天。

我本来想打报告,把杨中宝请回来当技术指导,补足他的原工资,外加讲课津贴。现在再也不敢惊动他了,让老人安度晚年。青年人的学习热情很高,不肯罢休,说是刚刚听出点味道来,怎么能停下呢!这话很对,我过去没有重视人才,更没有想到培养的问题,现在悔之未晚,得加倍努力!想来想去,想出了一个主意:出招贤榜!谁熟悉哪个烧菜的名手,都可以推荐,不管是在职的还是退休的,讲一课都是八块钱,年老体弱的人,可以叫出租汽车去接。

这一下可坏了,一张招贤榜又把个朱自治引到了我的身边!

十、吃客传经

不知道是谁首先想起了朱自治,一经宣扬以后人人都很同意。这使我十分吃惊,原来好吃也会有这么大的名气!

是的,请朱自治来讲课的理由是很充分的。他从一九三八年开始便到苏州来吃馆子——这还没有把他在上海的“吃龄”计算在内,不间断地吃到了大跃进之前。三年困难之间虽然一度中断,但他从未停止在理论上的探讨,据外间流传,就是在那极其困难的条件下,他写成了一本食谱。文化大革命期间他什么都肯交待,唯有这份手稿却用塑料纸包好埋在假山的下面。此种行为的本身就可以跻身于科学家、理论家、文学家的行列,且不说他到底写了点什么东西。包坤年说得好:“只要他讲讲一生都吃了哪些名菜,就可以使我们大开眼界!”我同意了。我再也不能把个人的好恶带到工作里。何况我不见朱自治已经整整十年,十年寒窗还能中状元,你怎么能把个朱自治看死呢?可是我没

有亲自登门求教,是包坤年叫了一部出租汽车去的。朱自治六十八岁,符合我所说的坐车条件。包坤年说他想借此机会去向朱自治和孔碧霞检讨,过去的事情是一时昏了头。我想也对,这个检讨由他去做比较适宜,谁欠的账谁还,我也不能包揽。

朱自治讲课的那一天,也是我主持会议。他的吃经我已经听过一些了,特别是关于南瓜盅,我的印象是很深的,我要听听这些年他到底有了哪些发展。

朱自治并不是很会讲话的人,尤其是到了台上,他总是结结巴巴,抖抖合合的。讲起吃来可大不相同了!滔滔不绝,而且方法新颖。他一登台便向听众提出一个问题:

“同志们,谁能回答,做菜哪一点最难?”

会场活跃,人们开始猜谜了:

“选料。”

“刀功。”

“火候。”

朱自治一一摇头:“不对,都不对,是一个最最简单而又最最复杂的问题——放盐。”

人们兴致勃勃了,谁也没有料到这位吃家竟然讲起了连一个小女孩都会做的事体。老太太烧菜的时候,常常在井边上,一面淘米一面喊她的孙女儿:“阿毛,替我向锅子里放点盐。”世界上最复杂和最简单的事情都有最大的学问,何况我们的几个老厨师都在频频点头,觉得是说在点子上面。

朱自治进一步发挥了:“东酸西辣,南甜北咸,人家只知道苏州菜都是甜的,实在是个天大的误会。苏州菜除掉甜菜之外,最讲究的便是放盐。盐能吊百味,如果在鲃肺汤中忘记了放盐,那就是淡而无味,即什么味道也没有。盐一放,来了,鲃肺鲜、火腿香、莼菜滑、笋片脆。盐把百味吊出之后,它本身就隐而不见,从来也没有人在咸淡适中的菜里吃出盐味,除非你是把盐多放了,这时候只有一种味:咸。完了,什么刀功、选料、火候,一切都是白费!”

我听了大为惊讶,这朱自治确实有点道理!

朱自治的道理还在向前发展:“这放盐也不是一成不变的,要因人、因时而变。一桌酒席摆开,开头的几只菜要偏咸,淡了就要失败。为啥,因为人们刚刚开始吃,嘴巴淡,体内需要盐。以后的一只只菜上来,就要逐步地淡下去,如果这桌酒席有四十个菜的话,那最后的一只汤简直就不能放盐,大家一喝,照样喊鲜。因为那么多的酒和菜都已吃了去,身体内的盐分已经达到了饱和点,这时候最需的是水,水里还放了味精,当然鲜!”

朱自治不仅是从科学上和理论上加以阐述,还旁插了许多有趣的情节。说那最后的一只汤简直不能放盐,是一个有名的厨师在失手中发现的。那一顿饭从晚上六点吃到十二点,厨师做汤的时候打瞌睡,忘了放盐,等他发觉以后拿了盐奔进店堂时,人们已经把汤喝光,一致称赞:在所有的菜中汤是第一!

整整的两个小时,朱自治没有停歇,使人感到他的学识渊博,像冰山刚刚露了点头。他在掌声中走下台来,挺胸凸肚,红光满面,满头的白发泛着银光,更增加某种庄重的气息。包坤年从人群中挤上去,紧紧地拉住了朱自治的手:“朱老,你讲得太好了,我都作了记录,只是记录得不全面,我想带只录音机到府上去拜访,请你再讲一遍。”

“这个嘛……可以,不过最好请你在下午三点以后,我吃了饭得睡一会。”

“当然当然,你以后的报告我一定当场录下来,不再麻烦你。我想根据录音再加整理。”

“不必了吧,我是随便讲讲的。”

“哪里,你的讲话太珍贵了,不留下来太可惜!”

“好吧,整理好给我看看。”

“一定,一定要请你过目的。”

朱自治到底在野鸡大学里混过,老来颇有点教授风度;包坤年一贯重视收集材料,热情也是可掬的;我也向朱自治发出邀请,请他下个星期继续讲下去。

朱自治连续为我们讲了三课,包坤年借来一只四喇叭,把朱自治的讲话全部录下。可惜的是讲到第二课大家便有点着急,讲了半天的盐,这盐怎么还没有放下去呢!厨师们不像我那么外行,放盐的重要性他们是知道的;他们更想知道朱自治在放盐上有哪些绝技。朱自治不像杨中宝,他只肯在台上讲,不肯到厨房里去表演。讲到第三课的时候便开始说故事了,说是哪一年和哪几个人去游石湖,吃了一顿船菜如何精美;哪一年重阳节吃螃蟹,光是那剔螃蟹的工具便有六十四件,全是银子做的。而且讲来讲去只有一个观点,现在的菜和过去不能比,他以前说皇帝不懂吃,现在又说清朝是如何的。我当然不能说他是宣扬今不如昔,却也产生了一点怀疑,饭菜不比文物,文物是越古的越值钱。如果在山洞里发现了一幅原始社会的壁画,哪,了不起!可那山洞里的烤野牛是否也算是最好吃的?厨师们打哈欠了,有的干脆回家去睡觉,说是不听他吹牛。讲到第四课味道就不正了,把什么大姑娘唱小曲儿,卖白兰花,叫堂会等等都夹在菜里面。

我决定叫暂停,可那包坤年有意见,说是这样珍贵的材料如果不及时抢救,那是要对历史负责的!

我听到对历史负责就发怵,心里就没有个底。很难说啊,万一那朱自治还有许多货真价实的东西没有讲出来,或者说他已经讲出来的东西我们并不理解,那倒真是要负责的!好在这一类的难题现在已经难不倒我了,我也学会了一套,即遇事拿不准时,千万不能说死,这里打一个坝,那里要留一个口,让他走着我瞧着,到时候再说话,总归是我对。

“这样吧,朱自治的报告必须暂停,因为人们已经听不下去。抢救材料的事情当然不能停,反正你已经开始了,那就由你负责到底,我可以提供一定的条件。”

包坤年雀跃了:“买个四喇叭!”

“四喇叭不能买,那是属于集团购买力,要上面批。录音磁带你可以买,宣传费用中可以报销,也不要全买 TDK,买点儿国产的。”

包坤年十分满意:“高经理,谢谢你的信任,我一定把这个任务好好地完成。”

讲课就这样结束了,朱自治前后讲了三课,三八二十四,外加出租汽车费。可是事情并没有结束,另外的一个口子还开着哩,那录音磁带不停地向外流。

包坤年每隔一个星期便要报销两盒磁带,而且全是 TDK,我在批发票的时候便问他:“你的任务什么时候才能结束呢?”

包坤年神气活现:“啊呀经理,现在的事情闹大了,到处都来请朱自治做报告,而且都是找我联系,不会有结束的时候。我们也不想结束,决定成立一个烹饪学学会,对外联络可以有个正式的名义。朱自治当会长,我当副会长,你也是发起人之一。考虑到你的工作忙,所以请你当理事长,挂挂名的。”

“啊!”我的脑袋嗡了一下,立刻产生了条件反射,那包坤年又成立战斗队!

“不不,我不能参加,我对烹饪学是一窍不通。”

“不需要你通,表示赞助而已。”

“不不,我赞助不起,我们没有那么多的宣传费,当年请张幻尔吃顿饭,也不过花了一盘磁带的钱。”

包坤年笑了:“经理呀,你也真是……赞助不等于要钱,钱我们有办法,可以印讲义。你看地摊上卖的《缝纫大全》,一本一块多,成本才几毛钱?穿的有人要,吃的还愁没有生意!何况我们可以乘做报告的时候往下发,用不着私人掏腰包,人家也有宣传费。”

我看着包坤年直翻眼,佩服。他实在比我还会做生意,我只想到掏私人的腰包,没想到要挖公家的宣传费。可以预料,那比掏私人的腰包更容易。我无权反对他们这样做,只好提一点忠告式的意见:

“讲义也不能瞎编呀,不能把那些大姑娘唱小曲儿等等的东西也编进去。”

“不不,讲义是我执笔的,它和小说不同,全谈学术,牵不到男女关系。”

我笑笑,在发票上签了个名:“拿去吧,下次请买国产的。”

包坤年拎起发票抖了抖:“放心吧,下次用不着你批了,我们还要

买四喇叭,买计算机!”

说实在,我没有把包坤年的话全当真的,他们想得起劲罢了,成立个学会谈何容易!就凭包坤年这点儿烧菜的本领,再加上朱自治讲放盐,又有多少学术可以研究呢,弄不成的。包坤年欢喜赶时髦,赶那么一阵子就要回头。

我想得太简单了,过分低估了包坤年的活动能力。不错,包坤年在烧菜方面的本领还没有学到家,可是他在估量形势,运用关系方面却很老练。饭店是个公共场所,什么人都有;有名的饭店当然会有有名的人物前来光顾,只要主动热情,多加照顾,帮着订菜订座,那关系便可以搭上去。老的搭不上便搭小的,通过小的也可以牵动老的,包坤年便由此而登堂入室,看准时机,帮助人家操办家庭宴会。儿女婚事,老朋相聚,用得着酒席的地方很多,花几个钱也不在乎,唯一困难的是缺少技术与劳力。包坤年精力充沛,技术虽然不太好,但他能请动技术很好的老师傅。老师傅会烧,朱自治会吹,包坤年能跑腿,酒席价廉物美,包你满意。乘人家吃得高兴时,他们便宣传烹饪学学会的宗旨,请求赞助。如果他们是成立营养学学会的话,赞助的人可能不多,营养学虽然可以防病健身,延年益寿,但是很难懂,而且也不如烹饪学实惠,烹饪学是看得见摸得着的,硬是有一桌丰美的筵席放在你的面前!“学会”二字也很有吸引力,反动学术权威早已打倒了,现在人人都知道,任何学术总比不学无术好,赞助学术不会犯错误,即使错了,学术问题也是可以讨论的,讨论得越多越有名气!

朱自治的名气越来越大了:一个老专家,在十年浩劫中写了一本书,某某经理看了佩服得五体投地,用小汽车接他去做报告,出两百块工资请他当顾问,他不去……

包坤年在外面活动的风声,朱自治那越来越大的名声,呼呼地吹到我的耳朵里。“让他走着我瞧着,到时候再发表意见。”现在时候已经到了,我也无话可说了。我不能说朱自治讲课是吹牛,大家别去听,听一次讲放盐还是可以的。我也不能揭朱自治的老底,说他一贯好吃,死不改悔……正中,一个人要做出点学问来,必须终身不渝,坚持到底!

对于包坤年我也不好说什么,我不能说他是开地下饭店,他再也不找我在发票上签字。唉,一切实用主义的工作方法都是自搬石头自砸脚,有的随搬随砸,有的从搬到砸要隔几十年!

十一、口福不浅

过了不久,我的老朋友阿二到店里来找我。我们两个人虽然不再住在一条巷子里,可是两家人家却经常来往。当我搬进新大楼的时候,他们一家都来道喜。连阿二的爸爸也由孙子们搀扶着爬上楼。他对我的妈妈说:“恭喜你呀老嫂子,你活了一生一世,从今以后再也不必担心房东会把你赶出去!”我的妈妈老迈了,回不出话来,只是擦眼泪。阿二更是经常到我家来,说说老话,坐一坐。有时候觉得老话也重复得太多了,便抽烟喝茶,无言相对,好像也是一种享受。他直接到店里来找我,这还是第一次。

阿二见了我便把手一举:“无事不登三宝殿,有件事情求求你。”

“什么事?”

“我家大男要结婚了,就在这个星期天。我想到你们店里订两桌酒席,可你们要排到三个星期之后!经理呀,能不能帮帮忙呢?”

我为难了:“哎呀,你何必来凑这种热闹,人家在饭店里摆酒是图排场,收人情,省事情。你也准备收人情吗,我应当送几十块呢?”

“去,我也不准备大请客。你家、我家、亲家,还有几个小朋友,总共不到二十人。”

“那好,两桌酒席你家摆不下吗,不能摆在天井里吗?你到店堂里去看看,闹哄哄的,想说几句高兴的话谁也听不见;到时候服务员要下班,拿着扫帚站在旁边,你能吃得安逸?”

“啧啧,哪有卖瓜的说瓜苦的。”

“瓜倒不苦,不是吹的,现在的几只菜都不推扳,表扬信收到了一大堆,可我总觉不如家宴随便。还有一个问题不好解决,我们有店规,凡属本店的工作人员,一律不得在本店与熟人同席,以免吃客们产生误

会。你叫我怎么办，站在边上看！”

“嗨，那不能。这一次我要好好地请你喝两杯，当年如果不是你动员我参加失业登记，今天的情况也许就是两样的。”

“行，自家办。我可以帮助你请个好厨师，呱呱叫的手艺。”

阿二笑了：“那倒不必，我们家人手多，个个能动手。鸟枪换炮啦，伙计，人人都有一两样拿手菜哩！”

“更好，一人烧一只，我烧最后的一只汤。”

阿二拱拱手：“免了，你的汤我已经领教过了。星期天晚上早点来，等你。”

我的心里喜滋滋的，真的等着这桌酒席。我给他家惹过麻烦，害得阿二的爸爸摆葱姜摊头；也就是在那个天井里，阿二叫我去拉过南瓜，如今在那里摆上两桌酒啊！不吃也美！

正当我美的时候，包坤年蹦跳着进来了，看样子他也很美；我美他也美，这个世界才会变得更美！

包坤年高高地叫了一声：“经理，给！”把一张印着金字的大红请柬塞到了我手里。我把请帖翻过来一看：“为庆祝烹饪学学会成立，特订于二十八日中午（星期日）假座××巷五十四号举行便宴招待各界人士，务请大驾光临。”好，又是一顿酒席来了！我对这桌酒席的反映很快，不假思索地便说了出来：“抱歉，我星期天有个约会，要到人家吃喜酒去。”说着便把请帖向桌上一丢。

包坤年搔搔头皮：“你那是什么时候？”

“晚上六点。”我又不假思索地说了出来。

“好极了，不冲突，我们是中午十二点。”

我再把请帖拿起来看看，果然不错，中午二字明明白白地印在那里。我只好摆观点了：“不行，我没有参加你们的学会，也算不了是哪一界的人士，去是不合适的。”

“经理呀，正是因为你不肯当理事长，才使得我们的工作进行得十分顺利，空出一个理事长的位子来，解决了大问题！要不然的话，我们早就吵散啦，学会到今天也不能成立！”

“噢!”原来如此,参加是一种赞助,不参加还是更大的赞助!事物的因果关系实在微妙之极!

“去吧经理,某某某都去了,你不去是不像话的。又不是开大会,也不要你发言,纯粹是吃,一顿美餐,不去很可惜。”

“我不大欢喜吃。”

“那就少吃点,见识见识,对你来说也是一种业务学习。老实告诉你吧,这一桌酒席是百年难遇。朱自冶指挥,孔碧霞动手,我们几个人已经忙了四天。所有的理事都想参加,挤不进来大有意见。没有办法,孔碧霞有规矩,最多不得超过八人,再三商量才同意改用圆台面,连你十个。”

包坤年的话使我动摇了。当年杨中宝到孔碧霞家去吃饭,只听说吃得好上天,却一直不知道究竟吃了些什么东西。如今有了机会,不去见识一下是会终身遗憾的。何况我参加不参加都是赞助,如果再空出一个位子来,还不知道会引出什么后果哩!

“好吧,我去。”

“一言为定,不来接你了,五十四号你是熟悉的。”

“太熟悉了,我闭上眼睛也能摸到。”

五十四号我是很熟悉,读中学的时候我每天都要从那里经过,常常看见有许多油光锃亮的黄包车停在门口,偶尔还有一辆福特牌的小轿车驶过来,把巷子里的行人挤得纷纷贴上墙头。那两扇黑漆的大门终日紧闭着,门上有一条缝,一个眼。缝里投信件,眼里装有玻璃,据说这是一种窥视镜,里面能看清外面,外面看不见里面,叫花子是敲不开门的。那时候沿门求乞的人很多,差不多的人家都装有这种东西。我从来不知道那门里是什么样子,只是看见那高高的围墙上长满了爬墙虎,每到秋天便飘送出桂花的香气。如今的桂子又飘香了,我从一个孩子变成了“各界人士”,又到了五十四号的门前。

那扇黑漆斑驳的大门敞开着,有一位年轻而漂亮的妇女站在门里面。她的穿着很入时,高跟皮鞋,直筒裤,银灰色的衬衫镶着两排洁白的蝴蝶边,衬衫也是束腰的。她笑嘻嘻地迎了上来,我以为是收入场券

的,连忙把请柬掏出来给她看。她掩嘴,深深一鞠躬,左手向前一伸:“请进。”跟着便高声地叫喊:“妈妈,高经理来啦!”

噢……对了,她就是孔碧霞的女儿,是那个政客兼教授留下来的。姑娘也应该有这么大了,连我的女儿都有了孩子。我再回过头来看看她,活像孔碧霞,孔碧霞年轻的时候,也该是一代风流!

孔碧霞从那条铺着石子的花径上走过来了。我抬头一看,简直不认识了,她好像已经把原来的脸型留给了女儿,自己变成了一个半老的贵妇。现在不会有人喊她干瘪老阿飞了,她也发了胖,胖得丰满圆润,比站在居委会门前请罪时年轻得多。她的头发向上反梳着,在后脑上高高隆起。这种高,正好抵消了因发胖而造成的横向发展,所以不会造成人们视觉上的错误,好像发了胖的女人都比以前矮了一点。她的衣着并不花哨,时间已经使她懂得了打扮的真谛;年轻而漂亮的人不管穿什么衣裳都好看,淡妆浓抹都相宜。年老的人如果要打扮的话,主要是用衣着来表示某种风度和气质而已。所以孔碧霞的衣着很素净,一件普通的蓝色西装外套,做工考究,质地高贵,和她的年龄、体型都很相配。

孔碧霞对我很热情,像她这样精细的人,很难忘记细小的事情。

“高经理呀,就怕你不来呐。唷,也老了,当阿爹了吧?”

“没有,刚当上外公。”

“好,都是一样的。快请进,就等你开席。”

我跟着孔碧霞往前走,一个幽雅而紧凑的庭院展现在面前。树木花草竹石都排列在一个半亩方塘的三边,一顶石桥穿过方塘,通向三间面水轩。在当年,这里可能是那位政客兼教授的书房,明亮宽敞,临水是一排落地的长窗。所有的长窗都大开着,可以看得清楚,大圆桌放在东首,各界人士暂时都坐在西头。

包坤年从石板桥上走过来了,把我向各界人士一一引见。其中有两位是朱自治的老吃友,我当年替他们买过小吃的。有一位是我的老领导,我年轻时便听过他的报告。其余的三位我都不熟悉,一个沉默寡言,两个谈笑风生,谈吐间流露出一股市侩气。

朱自治穿着一套旧西装,规规矩矩地系着一条旧领带,领带塞在西装马甲里。这套衣裳不知道是从哪个箱子的角落里翻出来的,散发着浓重的樟脑味,可是朱自治穿着并不显得滑稽,反而使我肃然而有敬意。好熟悉,这种装束是在哪里见过的?对了,我在读高中的时候,老师们的衣着基本上分为两大派。一派是长袍蓝衫,一派是西装革履。国文教员总是穿长袍,物理教师都是穿西装的。烹饪学属于科技,穿长袍蓝衫显得太陈旧,穿制服又没有特点,穿崭新的西装又显得没有根基,西装而是旧的,妙极!好像是一个潦倒多年的老科学家刚被重视,刚被发现!这一身打扮肯定是出于孔碧霞的大手笔,朱自治穿衣裳一贯是很拆烂污的。

朱自治多年不穿西装了,行动很不自然,碰碰撞撞地越过几张椅子,把一本烹饪学讲义塞到了我的手里。我拿着讲义在我的老领导的面前坐下,也觉得十分拘谨。解放初期当我还在工作队的时候,曾经和这位领导同志有过一段时间的接触,在我的印象中他是个不苟言笑,要求严格,对知识分子有点不以为然的人。我们那一伙“小资产”在他的面前都装得十分规矩而谨慎。今天在此种场合中相遇,还使我感到有点手足无措,最主要的是找不出话来说,只好把手中的讲义慢慢地翻阅。

“小高。”

“哦。”

老领导叫了我一声小高以后,也发现我的年纪已经不小了,立刻改了口:“老高呀,你要好好地看看这本书,多向人家学习学习。”

“是,我一定好好地拜读。”

“现在不能靠外行领导内行了,要好好地钻进去。”

“是的,我在这方面过去犯过错误。”

“知道错误就好,现在还来得及。”

我点点头,继续把讲义翻下去,发现这本由朱自治口述,包坤年整理的大作并不是什么新鲜的东西,是从几种常见的食谱中抄录而来的,而且错漏很多,不知道是抄错的还是印错的。我抬起头来看看朱自治,

想向他提出一点问题,可那朱自治却避开我的目光,双手向前划着,好像赶鸭子似的请大家入席。

人们鱼贯而出,互相谦让,彬彬有礼,共推我的老领导走在前面。

人们来到东首,突然眼花缭乱,都被那摆好的席面惊呆了。洁白的抽纱台布上,放着一整套玲珑瓷的餐具,那玲珑瓷玲珑剔透,蓝边淡青中暗藏着半透明的花纹,好像是镂空的,又像会漏水,放射着晶莹的光辉。桌子上没有花,十二只冷盆就是十二朵鲜花,红黄蓝白,五彩缤纷。凤尾虾、南腿片,毛豆青菽、白斩鸡,这些菜的本身都是有颜色的。熏青鱼,五香牛肉,虾子鲞鱼等等颜色不太鲜艳,便用各色蔬果镶在周围,有鲜红的山楂,有碧绿的青梅。那虾子鲞鱼照理是不上酒席的,可是这种名贵的苏州特产已经多年不见,摆出来是很稀罕的。那孔碧霞也独具匠心,在虾子鲞鱼的周围配上了雪白的嫩藕片,一方面为了好看,一方面也因为虾子鲞鱼太咸,吃了藕片可以冲淡些。

十二朵鲜花围着一朵大月季,这月季是用钩针编结而成的,很可能是孔碧霞女儿的手艺,等会儿各种热菜便放在花里面。一张大圆桌就像一朵巨大的花,像荷花,像睡莲,也像一盘向日葵。

人们从惊呆中醒过来了,发出惊讶的叹息:

“啊……”

“啧啧。”

还没有入席我就受到批评了:“老高,你看看,这才是学问呐!看你们那个饭店,乱糟糟的。”

我没有吭气,四面打量,见窗外树影婆娑,水光耀廊,一阵阵桂花的香气,庭院中有麻雀吱吱唧唧。想当年那位政客兼教授身坐书房……

朱自治又把两手向前划着,邀请大家入座。同时把领带拉拉松,作即席讲说:

“诸位,今天请大家听我指挥,喝什么酒,吃什么菜,都是有学问的。请大家不要狼吞虎咽,特别是开始时不能多吃,每样尝一点;好戏还在后面,万望大家多留点儿肚皮……”

人们哈哈地笑起来了,心情是很愉快的。

“……吃,人人都会,可也有人食而不知其味,知味和知人都是很困难的,要靠多年的经验。等会儿我可以一一介绍,敬请批评指教。开席,拿酒杯。”

包坤年立即打开酒橱,拿出一套高脚玻璃杯,两瓶通化的葡萄酒。这一套朱自治不说我也懂了,开始的时候不能喝白酒,以免舌辣口麻品不出味。可我就想喝白酒,我学会喝酒是在困难的时刻,没有六十四度不够味。

包坤年替大家斟满了酒,玻璃杯立刻变成了红宝石,殷红的颜色透出诱人的光辉。葡萄美酒夜光杯,那制作夜光杯的白玉之精也可能就是玻璃。

包坤年是副会长,斟完了酒总要讲几句的,为了要突出朱自治,多讲了也不适宜,便举起筷子来带头:“同志们请吧,请随意……”

朱自治也不想为别人留点面子,煞有介事地制止:“不不,丰盛的酒席不作兴一开始便扫冷盆,冷盆是小吃,是在两道菜的间隔之中随意吃点,免得停筷停杯。”说着便把头向窗外一伸,高喊:“上菜啦!”

随着这一声叫喊,大家的眼睛都看住池塘的南面,自古君子远庖厨也,厨房和书房隔着一池碧水。

电影开幕了:孔碧霞的女儿,那个十分标致的姑娘手捧托盘,隐约出现在竹木之间,几隐几现便到了石板桥的桥头。她步态轻盈,婀娜多姿;桥上的人,水中的影,手中的盘,盘中的菜,一阵轻风似的向吃客们飘来,像现代仙女从月宫饭店中翩跹而来!该死的朱自治竟然导演出这么个美妙的镜头,即使那托盘中装的是一盆窝窝头,你也会以为那窝窝头是来自仿膳,慈禧太后吃过的!

托盘里当然不是窝窝头,盖钵揭开以后,使人十分惊奇,竟然是十只通红的番茄装在雪白的瓷盘里。我也愣住了,按照苏州菜的程式,开头应该是热炒。什么炒鸡丁,炒鱼片,炒虾仁等等的,从来没见过用西红柿开头!这西红柿是算菜还是算水果呢?

朱自治故作镇静,把一只只的西红柿分进各人的碟子里,然后像变戏法似的叫一声“开!”立即揭去西红柿的上盖:清炒虾仁都装在番

茄里！

人们兴趣盎然，纷纷揭盖。

朱自治介绍了：“一般的炒虾仁大家常吃，没啥稀奇。几十年来这炒虾仁除掉在选料与火候上下功夫以外，就再也没有其他的发展。近年来也有用番茄酱炒虾仁的，但那味道太浓，有西菜味。如今把虾仁装在番茄里面，不仅是好看，请大家自品。注意，番茄是只碗，不要连碗都吃下去。”

我只得佩服了，若干年来我也曾盼望着多给人们炒几盘虾仁，却没有想到把虾仁装在番茄里。秋天的番茄很值钱，丢掉多可惜，我真想连碗都吃下去。

唔，经朱自治这么一说，倒是觉得这虾仁有点特别，于鲜美之中略带番茄的清香和酸味。丁大头说得不错，人的味觉都是差不多的，不像朱自治所说有人会食而不知其味。差别在于有人吃得出却说不出，只能笼而统之地说：“啊，有一种说不出的好吃！”朱自治的伟大就在于他能说得出来，虽然歪七歪八地有点近于吹牛，可吹牛也是说得出来的表现。在极力的享受和娱乐之中，不吹牛还很难使那近乎呆滞的神经奋起！

仙女在石板桥上来回地走着，各种热炒纷纷摆上台面。我记不清楚到底有多少，只知道三只炒菜之后必有一道甜食，甜食已经进了三道：剔心莲子羹，桂花小圆子，藕粉鸡头米。

朱自治还在那里介绍，这种介绍已经引不起我的兴趣，他开头的一笔写得太精彩了，往后的情节却是一般的，什么芙蓉鸡片，雪花鸡球，菊花鱼等，我们店里的菜单上都有的。

人们的赞叹和颂扬也没有停歇：

“朱老，你的这些学问都是从哪里得来的？”

“很难说，这门学问一不能靠师承，二不能靠书本，全凭多年的积累。”

“朱老，你过了一世的快活日子，我们是望尘莫及。”

“哪里，彼此彼此，文化大革命和困难年也是不好过的。”

“算啦,那些事情都过去了,吃吃!”

“是呀,将来到了共产主义,我们大家天天都能吃上这样的菜!”

我听了肚里直泛泡,人人天天吃这样的菜,谁干活呢,机器人?也许可以,可是现在万万不能天天吃,那第五十八代的机器人还没有研制出来哩!

“老高。”

“啾。”

“你为什么不说话呀,像朱老这样的人才你以前一点儿也不知道吗?”

“知道,我很早便知道。”

“那你为什么不请他去指导指导,把你们的饭店搞搞好。”

“请……请过,我们请他讲过课。”

“那是临时的,没有个正式的名义。”

人们突然静下来,目光都集中在我的身上。我凝神了。在这今天的这顿美餐里,似乎要谈什么交易?!

“名义……这名义就很难说了。”

“也是一种专家嘛!”

“叫什么专家好呢?”我等待着人们的回答。科学家、文学家、表演艺术家,你哪一家都靠不上去!

“吃的……”说不下去了,“吃的专家”是骂人的。

“会……”会吃专家也不通,谁不会吃?

包坤年把筷子一举:“外国人有个名字,叫‘美食家’!”

“好!”

“对!”

“美食家,美食家!”

“来来,为我们的美食家干一杯!”

朱自治踌躇满志了,忍不住把那旧西装敞开,举杯离座,绕台一周,特别用力地和我碰了碰杯,差点儿把那薄薄的玻璃杯都碰碎。是呀,他那吃的生涯如今才达到了顶点;辛辛苦苦地吃了一世,竟然无人重视,

尚且有人反对。真正的价值还是外国人发现的！

我只恨自己的孤陋寡闻，一下子就败在包坤年的手里。我只知道引进“快餐”，却没有防备那“美食家”也是可以引进的。好吃鬼，馋痨坯等等都已经过时了，美食家！多好听的名词，它和我们的快餐一样，也可以大做一笔生意。如果成立世界美食家协会的话，朱自治可当副主席；主席可能是法国人，副主席肯定是中国的！

人们在欢乐声中拨动了第十只炒菜，这时候孔碧霞走了进来，询问大家对炒菜的意見。人们纷纷道谢，邀请孔碧霞同饮一杯。我站起身来为孔碧霞斟满酒，举起杯：

“谢谢朱师母，你的菜确实精美，谢谢你，也谢孩子，她为我们奔走了半天。”我对孔碧霞也没有多少好感，但是我得承认，她确实是做菜的能手，二级厨师的手艺，应该由她来当烹饪学学会的主席或者是副主席。世界上的事情会做的往往不如会吹的，会烧的也不如会吃的！

孔碧霞很高兴：“哪里，能得到经理的称赞很不容易。”她举起杯来划了个大圈子：“怠慢大家了，几只炒菜连我也不满意，现在没有冬笋，只好用罐头。”

“啊，没说的。”

“来来，为美食家的夫人干一杯！”

一杯干了以后，包坤年开始收酒杯了，别以为宴会已经结束，早着呢，现在是转场，更换道具的。

朱自治又拿出一套宜兴的紫砂杯，杯形如桃，把手如枝叶，颇有民族风味。酒也换了，小坛装的绍兴加饭、陈年花雕。下半场的情绪可能更加高涨，所以那酒的度数也得略有升高。黄酒性情温和，也不会叫人口麻舌辣。我向那酒橱乜了一眼，看见还有两瓶五粮液放在那里，可能是在喝汤之前用的。我暗自思忖，这桌饭不知是谁出钱，是朱自治的银行存款呢，还是人家的宣传费？

孔碧霞告辞以后，下半场的大幕拉开，热菜、大菜、点心滚滚而来：松鼠桂鱼，蜜汁火腿，“天下第一菜”，翡翠包子，水晶烧卖……一只“三套鸭”把剧情推到了顶点！

所谓三套鸭便是把一只鸽子塞在鸡肚里,再把鸡塞到鸭肚里,烧好之后看上去是一只整鸭,一只硕大的整鸭趴在船盆里。船盆的四周放着一圈鹌鹑蛋,好像那蛋就是鸽子生出来的。

人们叹为观止了:

“老高。”

“噫。”

“你看看,这算不算登峰造极?”

“算。”

“就凭这一手,让朱老到你们的店里去当个技术指导还不行,每月给个百二八十的。”

我明白了,这恐怕是今天的中心议题,连忙采取推挡术:“不敢当,我们的庙小,容不下大菩萨。”

“你们的庙也不小呀,就看庙主的眼力……”

幸亏那只三套鸭帮了忙,当它被拆开以后人们便顾不上说话了,因为嘴巴的两种功能是不便于同时使用的。

我看了看表,这顿饭已经吃了将近三个钟头,后面还要喝五粮液(我很想喝),还会有一只精彩的大汤作总结,还会有生梨或者是菠萝蜜。可我不敢终席了,因为终席之后便是茶话,那圈套便会绕到我的脖子上面。

“实在对不起,我下面还有一个约会,不能奉陪到底。谢谢朱先生,谢谢诸位,谢谢……”我不停地说谢谢,不停地向后退,退了五步便转身,径奔石板桥而去。过得桥来回头看,见那长窗里的人都呆在那里。

我觉得今天的举止很不礼貌,也不光彩,好像是逃出来的。如果不向女主人打个招呼,那孔碧霞会伤心,她是很要场面的。

孔碧霞和她的女儿还在忙着,听说我要走,有点儿扫兴:“啊呀,大概是我做的菜不好吧,不合你的口味!”

“哪里,你的菜做得确实不错,什么时候请你到我们的店里去讲讲,交流交流。”

孔碧霞笑了:“有什么好交流的,这些菜你们都会做,问题是你们没有这么多的时间,细模细样地做,还得准备个十几天……哎,你不能

再坐会儿吗,还有一只大汤咧。”

“知道……”我突然想起件事情来了:“朱师母,今天的甜菜里面怎么没有南瓜盅?困难年朱先生和我一起去拉南瓜的时候,说是要创造出一只南瓜盅,有田园风味!”

孔碧霞咯咯地笑了:“你听他瞎吹,他这人是宜兴的夜壶,独出一张嘴!”

十二、巧 克 力

出了五十四号向西走,到阿二家去。天啊,那里还有一桌酒席等着我哩!我什么也不想吃了,三套鸭不好消化,那一番谈话也值得回味。可我想和阿二、和他的爸爸干几杯,当然是白酒,六十四度,喝下一口之后像一条热线似的直通到肚里,哈地一声长叹,人间无数的欢乐与辛酸都包含在内。

秋天对每个城市来说,都是金色的。苏州也不例外,天高气爽,不冷不热,庭院中不时地送出桂花的香气。小巷子的上空难得有这么蓝湛,难得有白云成堆。星期天来往的人也不多,绝大部分的人都在忙家务,家务之中吃为先,临巷的窗子里冒出水蒸气,还听到菜下油锅时噉啦一声炸溜。

从五十四号到阿二家,必须经过我原来住过的地方,这地方的样子一点儿也没有变。石库门,白粉墙,一排五间平房向里缩进一段,朱自治住过的小洋楼就在里面。我仿佛看见阿二的黄包车就停在门前,朱自治穿着长袍从门里出来,高踞在黄包车上,脚下铃铛一响,赶到朱鸿兴去吃头汤面。四十年来他是一个吃的化身,像妖魔似的缠着我,决定了我一生的道路,还在无意之中决定了我的职业。我厌恶他,反对他,想离他远点。可是反也反不掉,挥也挥不走,到头来还要当我的指导,每月给个百二八十的。百二八十是多少?加起来除以二,正好是一百元人民币!如果杨中宝能来当指导,我情愿在一百之外再加二十,奖金还不计算在内。可这朱自治算什么,食客提一级最多是个清客而已,他

可以指导人们去消遣,去奢靡,却和我们的工作没有多大的关系。美食家,让你去钻门子吧,只要我还站在庙门口,你就休想进得去!

一直走到阿二家,我心中的怨气才稍稍平息。这里是个欢乐的世界,没有应酬,没有虚伪,也谈不上奢靡。天井里坐满了人,在那里嗑瓜子,吃喜糖。我的一家都来了,包括我那个刚满周岁的小外孙在内。这孩子长得又白又胖,会吃会笑,还会做眯眼,捏捏小拳头和人表示再会。现在都是独生子女,一个娃娃可以有六个大人在他的身上花费物力和精力。满天井的人都以娃娃为中心,给他吃,逗他笑,从这个人的手里传到那个人的手里。

有人把硬糖塞到我那小外孙的嘴里,他立刻吐了出来。

“怎么,他不吃糖吗?”

“他呀,要吃好的!”

“试试,给他巧克力。”

有人拿了一条巧克力来,剥去半段金纸,塞到孩子的手里。果然,这孩子拿了就往嘴里送,吃得滋滋咂咂地流口水。

人们哄笑起来了:“啊呀,这孩子真聪明,懂得吃好的!”

我的头脑突然发炸,得了吧,长大了又是一个美食家!我一生一世管不了个朱自治,还管不了你这个小东西!伸手抢过巧克力,把一粒硬糖硬塞在小嘴里。

孩子哇地一声哭起来了……

满座愕然,以为我这个老家伙的神经出了问题。

一九八二年八——九月

附言:本文是小说,纯属虚构,不得已而借用苏州风物,此亦文学之惯技,务请读者诸君不必一一查对。

——作者再拜。

——选自《收获》1983年第1期